

# 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历史道路

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研究室 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历史道路》

## 编委会

主 任 陈 竺 刘晓峰

副主任 何 维 龚建明 曲凤宏

委 员 隋 路 邓蓉玲 杨晓波

张庆伟 王素芳 游宏炳

郭洪泉 李 新 耿丽丽

李 想

执 笔 人 游宏炳 张意愿

# 目 录

引言

## 一、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创立

宋庆龄提出“相约集合同志，为继承孙中山的遗教而奋斗到底”

宋庆龄、邓演达、陈友仁联名发表《莫斯科宣言》

邓演达探索建立新的革命政党

中国农工民主党第一次全国干部会议

## 二、开展以推翻蒋介石政权为目标的革命活动

建党后全面开展倒蒋斗争

邓演达殉难，武装起义受挫

鼓动和支援“一·二八”淞沪抗战

参与策动“福建事变”

## 三、在抗日烽火中同中国共产党亲密合作

对中国共产党认识的深化

确立同中国共产党合作的政治路线

积极推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投身全面抗战

在抗日烽火中同中国共产党结成了患难与共、

风雨同舟的亲密关系

- 四、为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和建立新中国而奋斗  
拥护国共和谈，支持中国共产党的立场和主张  
围绕政协协议同国民党一党独裁作斗争  
投身国统区的爱国民主运动  
支援和参加人民解放战争开展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军事运动
- 五、应中国共产党邀请参加新政协筹建新中国  
响应中国共产党“五一”口号，作出政治抉择  
应中国共产党邀请北上参加筹备新政协  
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参加新中国人民政权
- 六、致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  
中共中央高度关心重视民主党派  
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  
继往开来续写新篇章

附录：中国农工民主党历届中央主席（主要领导人）、中央常务副主席简介

# 引 言

中国农工民主党(简称农工党)自 1930 年 8 月 9 日成立以来,经过了 80 多年的风雨历程,走过了从爱国主义到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历史道路,同中国共产党建立了深厚情谊和亲密合作关系。

中共中央对农工党的历史给予高度评价。2010 年 8 月,中共中央在致农工党成立 80 周年纪念大会的贺词中说:“中国农工民主党自 1930 年成立至今,走过了一条从爱国主义到社会主义的历史道路,形成了爱国革命的优良传统,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为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做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2012 年 12 月,中共中央在致农工党十五大的贺词中说:“中国农工民主党具有光荣历史和

优良传统。1930 年成立以来，一代又一代农工党中央领导人带领广大成员与中国共产党亲密合作、团结奋斗，经受了血与火的考验，走过了不断追求进步的光辉历程。”中共中央的高度评价，是对农工党爱国革命光荣历史的充分肯定。

农工党是在国共两党合作开展的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后，邓演达等国民党左派人士为继承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继续领导国民革命而建立的革命组织。因此，了解农工党成立的背景，首先需要了解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了解孙中山的“三大政策”，了解孙中山的革命活动。

孙中山探索中国革命，于 1894 年成立了近代中国第一个革命团体“兴中会”。1905 年建立了第一个全国性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中国同盟会”确认以孙中山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十六字为政治纲领。这十六字的政治纲领被解释为“三民主义”，

即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

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创立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领导制定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试图仿照西方国家的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的代议政治原则，建立多党制模式的政治制度。但袁世凯在窃取辛亥革命成果、就任临时大总统后，即废止《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解散国会，走向独裁，标志着民国初年试图仿照建立西方多党制模式的政治制度的完全失败。

孙中山继续探索中国革命。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孙中山将向西方学习的目光转向俄国。孙中山秘密会见列宁和共产国际派到中国的代表，接受了共产国际代表关于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和改组中国国民党的建议。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孙中山对中国国民党进行了改组，于1924年在广州召开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

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形成，揭开了近代中国民主革命的新篇章，迎来了孙中山盼望已久的国民革命的新高潮，极大地推动了中国革命事业的向前发展。国共合作创办军校、镇压叛乱、征讨军阀、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封建军阀的反动势力，革命形势一片大好。毛泽东同志曾经这样评价第一次国共合作和革命斗争发展的大好形势，正是“由于两党在一定纲领上的合作，发动了1924年至1927年的革命。孙中山先生致力于革命凡四十年还未能完成的革命事业，在仅仅的两三年之内，获得了巨大的成就，这就是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创立和北伐战争的胜利。这是两党结成了统一战线的结果。”

就在国民革命形势不断高涨的同时，一股反革命逆流也逐渐显现出来。国民党内部的左右派进一步分化，国共关系逐步复杂化。北伐胜利进军之时，蒋介石反共反人民的面目暴露出来。1927年4月和7月，蒋介石、汪精卫先后背叛孙中山的“三

民主义”和“三大政策”，大肆抓捕屠杀共产党人、国民党左派人士和革命群众，国共合作开创的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以失败告终。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集团蜕变为大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的代理人。中国共产党退出国民政府，举起“苏维埃”旗帜，独立领导开展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邓演达等国民党左派力量坚持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酝酿建立新的革命组织，继续领导国民革命。

# 一、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创立

## 1、宋庆龄提出“相约集合同志，为继承孙中山的遗教而奋斗到底”

1927年5月间，宋庆龄同邓演达、陈友仁、彭泽民、徐谦、陈其瑗等交换意见，提出要“相约集合同志，为继承孙中山的遗教而奋斗到底。”

1927年5月底至7月，邓演达、谭平山分别与章伯钧、郑太朴、施复亮、陈公博等商谈组党问题，认为中国需要成立一个新的革命组织，以统一革命的领导，集中革命的势力，继续领导中国革命。对此，除陈公博拒绝外，其他人都表示赞同。在

北伐军总政治部的干部和革命的知识分子中，很多人都接受了邓演达的意见。

邓演达、陈友仁、彭泽民、徐谦、陈其瑗等，都是长期追随孙中山开展革命活动的得力干将。陈友仁自 1922 年起任孙中山的外事顾问、英文秘书，1926 年担任广州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彭泽民追随孙中山革命几十年，1906 年就加入了中国同盟会，是同盟会吉隆坡分会负责人之一，主要负责为孙中山开展革命活动筹款。1924 年回到广州参加民主革命活动，在国民党二大上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海外部部长，国民政府委员。徐谦 1912 年出席中国同盟会等 5 个团体正式改组为国民党的成立大会，1917 年任孙中山领导的广州军政府的秘书长，1921 年被孙中山任命为最高法院院长。陈其瑗也是孙中山的积极追随者，竭诚拥护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主张国共合作等。

邓演达是同盟会培养的优秀人才，自幼立志做革命党人。1909 年邓演达 14 岁，

在同盟会员、广东陆军小学堂学长（相当于队长）邓铿的引导下，考入广东陆军小学堂学习。毕业后，又先后进入广东陆军速成学校、武昌陆军第二预备学校、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学习。在1909至1919年10年军校学习期间，邓演达先后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广州庚戌新军起义、辛亥革命和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等，是孙中山的积极追随者。

邓演达对国民革命夙具忠心，保定军校毕业后不久，即投身孙中山直接领导的军队——援闽粤军，忠勇奋发，品德高尚，展现出优秀的军事才能和政治素质，在孙中山指挥的讨伐叛军、巩固广东国民革命根据地的战斗中，战功显赫，深得孙中山的信任与赏识，受到孙中山的器重。孙中山说：“干革命，有两达（指张民达、邓演达），革命有希望。”

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邓演达竭诚拥护、忠诚贯彻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积极协助孙中山创办

黄埔军校，先后担任该校教练部副主任兼学生总队队长、教育长等职，同中国共产党人真诚合作，为教育和培养新型革命军队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深受广大黄埔师生的尊敬。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右派猖獗一时，邓演达和国民党左派人士、中国共产党人一起，坚决维护“三大政策”，反击国民党右派的倒行逆施。

在北伐战争中，邓演达担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以其杰出的政治工作者和军事指挥者的卓越才干，为消灭北洋军阀主力建立了卓越功勋。国民革命军占领武汉后，邓演达兼任湖北省政务委员会主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武汉行营主任等 20 多个职务，领导着新生的革命政权，是武汉地区党政军的中枢人物，展现了出色的领导才能。他为将汉口、九江英租界收回中国政府管理作出了重要贡献。邓演达与共产党人亲密合作，特别是在武汉政府时期，他兼任中央农民部长，同毛泽东同志志同道合开展农民运动，一起创

办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在发动农民运动，壮大革命同盟军等问题上，周恩来同志评价说：邓演达与毛泽东同志的意见一致，积极主张摧毁封建势力。

蒋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中国革命处于危亡之际，引起了邓演达等忠诚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三大政策”，拥护国共合作的革命志士对中国革命前途的忧虑，他们都在思考如何继承孙中山的遗教，把孙中山开创的事业进行到底。



1927年3月，中国国民党在武汉举行二届三中全会。在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共同努力下，会议通过了20多项重要决议，旨在防止个人独裁和军事专制。图为与会者合影中的毛泽东（前右）、彭泽民（前左）、邓演达（后右）、恽代英（后左）。



1927 年大革命失败后，邓演达、宋庆龄先后于 8 月中旬和 9 月上旬到达莫斯科。图为邓演达（右）与宋庆龄（中）、鲍罗廷（左）、王人达（前坐者）在苏联高加索考察时的合影。

## 2、宋庆龄、邓演达、陈友仁联名发表《莫斯科宣言》

蒋介石以“煽动暴乱”罪名通缉邓演达。在武汉，机枪已对准邓演达的住处。邓演达深感大革命的失败已无可挽回，于1927年6月30日秘密离开武汉，8月15日到达苏联莫斯科，受到苏联红军总司令部的热情接待。9月7日，宋庆龄、陈友仁到达莫斯科，受到苏联外交部的热烈欢迎。邓演达、宋庆龄、陈友仁等相聚莫斯科以后，主要就复兴中国革命的问题常相计议，认为中国革命不能中断，在目前情况下，有成立组织作为临时性的革命领导机构之必要。但这个组织，应该是一个独立的、中国式的、贯彻孙中山“三大政策”的革命团体，它愿意与第三国际合作，同中国共产党携手。为此，邓演达一方面函促已

到上海的谭平山等人，要他们在国内尽量团结国民党左派和一切革命分子。一方面写信给已经到达香港的彭泽民、何香凝等征求意见，邀请他们“共同发起建立革命的组织”。此外，邓演达还分别与叶挺、郑太朴、季方、黄琪翔等书信往来，互通消息。

1927年11月1日，宋庆龄、邓演达、陈友仁在莫斯科联名发表由邓演达起草的《对中国及世界革命民众宣言》（又称《莫斯科宣言》）。在宣言起草过程中，关于临时性的革命领导机构的名称问题，宋庆龄认为：我们还是要按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去做，现在要的是行动和行动的人。陈友仁也提议：我国华侨对国民党有感情，为了能对华侨发生影响，还是要把国民党摆在前面。所以，宣言是用“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的名义发表的。

宣言强调：“‘三民主义’的真正意义，就是反对帝国主义到底，推翻封建特权阶级和一切少数宰割多数的反动势力，

推翻少数剥削多数的经济制度。这就是孙中山先生根据中国的特殊环境所拟定的革命大纲，也就是他的党徒行动奋斗的准绳和大多数民众的希望”。宣言指出：“现在已证明本党的上层领导已完全违背而且背叛本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付托，革命民众的希望。他们无论为南京为武汉，皆窃取中国国民党之旗号，曲解及假托革命‘三民主义’之内容，其实已为旧势力之化身，军阀之工具，民众之仇敌。”

宣言分析了“中国民众之痛苦，根本原因在帝国主义与封建军阀、地主豪绅及大部分与他们联合的高利资本家的共同勾结所构成之中国政治经济势力的统治。”所以“农民的势力必为中国革命的主要成分，工人必为中国革命之‘机轮’，手工业工人、小商人以及青年学生的大部分，均必加入革命的行列”。因此，宣言确认：“中国被压迫剥削的革命民众，为工人、农民、手工业者、小商人及青年学生。其对抗的仇敌，为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地

主豪绅及与他们相结合之高利资本家者”。宣言提出：“中国革命之结果，其政权主要的掌握在工农为中心的平民群众手上；其经济建设，必超越资本主义之毒害，向社会主义前进，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亦即本此使命，在其伟大的领袖孙中山先生的精神领导底下，去团结领导被压迫剥削的革命民众，向一切反动仇敌进攻，把‘三民主义’的革命纲领完全实现”。宣言强调：“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还不是一个脱离了国民党的新政党，而只是为了挽救中国国民党和复兴中国革命的一个临时性的“中国国民党左派的革命团体”，它的责任是“宣告南京武汉的伪党部中央之罪过，以革命手段中止其受第二次大会委托之职权，并临时行使革命指导之机能”。《莫斯科宣言》表达了宋庆龄、邓演达等继承孙中山的遗志，寻求民族解放、走向社会主义的决心，为团结大革命失败后在政治上彷徨苦闷的革命同志树起了一面旗帜。

## 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對中國及世界革命民眾宣言

一九二七，十一月，一

中國現在已大到一个新的局勢。在此局勢的下面，帝國主義者由消極的援助反革命勢力的時期，進入到積極的進攻中國時期。直接的間接的打擊一切民族的解放運動，更以全力佔據中國內地及沿岸。北方的舊軍閥，在風火驟生的急中，雖有希望其勢力之擴大延長，因此對於民衆更加加緊壓榨，長江中部及東南各省之新軍閥，無處不假託中國民族之旗幟，以欺騙民衆，以行其侵害窮餓的私慾；地主，土豪，紳士，實則更在此民衆勢力情形畏縮的局勢下面，對工農軍衆加緊其殺害和剝削，以相報復，因此形成新的黑暗反動時代。在其他一面，革命的民衆，由希望解放的理想而進入於實行鬥爭，由依靠「好政府」盼望「真天子」的迷夢中覺醒，必然的要由無出所措，去進行新的解放自己的工作。在這樣的一個新局勢之下，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特對全世界及中國革命民衆，將此黑暗局勢的由來及本黨責任，懸布宣告：

中國國民黨，由他的偉大的總理孫中山先生所創造，代表全中國勞苦民衆的希望，經過四十多年的奮鬥，首先和國內的高壓滿清政府決裂，其次和歐派滿清封建勢力作最頑抗及其他軍閥鬥爭。最近幾年來，更把牠的根柢，建築在民衆本身，以作最後的革命決鬥。牠的行動綱領，已表現在孫中山先生所主張的三民主義當中。三民主義的真正意義，是：民族主義，是：反對帝國主義到底，要得

到中國民族的自由和獨立，并使國內各弱小民族自由獨立。民權主義，是：要強固此種極階級，和一切少數黨派多數的反動勢力，由大多數勞苦民衆，自己建設平民的政府。民生主義，是：要推翻少數剝削多數的經濟制度，把中國貧困絕望的境況中救出，以勞動民衆所生產的一切勞動民衆享受。這就是孫中山先生根據中國的特殊環境，所擬定的革命大綱，也就是他的黨徒行動奮鬥的基礎和大多數民衆的希望。

但是革命勢力的增加，必然引起反革命勢力的反動，更促使黨的投機妥協搖動份子的現形。自本黨總理孫中山先生逝世時，即一面與敵人密鬥，一面更須與黨內的叛徒決絕；在一九二二年滿清推倒以後，本黨正在努力進清封建勢力，而帝國主義者極力援助封建勢力的代表者袁世凱，本黨從袁世凱等更阻撓妨害革命的進行，以致辛亥革命的行程中斷。孫中山先生不絕而當時的敵人及叛徒等門，故有中華革命黨之組織。一九二四年本黨重行改組爲中國國民黨，更擴大力量於天下層民衆，因此帝國主義者及封建軍閥的仇視，與其他社會上層的統治份子的懷疑加甚。本黨總理孫中山先生更努力與一切敵人及黨內的叛徒決鬥，因此革命勢力擴大，使全國勞苦民衆打倒風潮起。孫中山先生逝世以後，敵人遂勾結其，本黨叛徒之陰謀愈張，因此有西山會議派的產生；胡漢民同志的努力，將

1927年11月1日，邓演达与宋庆龄、陈友仁以“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的名义发表《对中国及世界革命民众宣言》，即《莫斯科宣言》。

### 3、邓演达探索建立新的革命政党

#### 邓演达探索革命道路

宋庆龄、邓演达等前往苏联，主要是寻求苏联继续对中国国民革命事业的支持。在苏联，邓演达受到苏联最高领导人斯大林的接见，在共产国际召开的欢迎大会上，邓演达应邀作了《中国革命最近的严重局势之由来》的长篇报告，与共产国际领导人交换中国革命的意见，开展对苏联革命与建设的调查研究工作。但邓演达关于中国国民革命的一些想法不为苏联领导人和共产国际领导人所赞同。邓演达深感自己所坚持的“国共合作、国民革命”的主张，在苏联已经得不到同情和支持。同时，邓演达也认为俄国革命的经验不适合中国。1927年底，邓演达带着失望离开了苏联，前往德国继续寻求中国革命的答

案。

宋庆龄在晚年回忆这段历史时说：“当我认识到斯大林不想继续帮助我们而听任蒋介石得逞时，我就不愿在莫斯科多呆了，我请母亲给我寄一些钱来，然后就到欧洲去。”

在德国，邓演达大量读书学习，对马克思主义著作，对历史、经济、哲学、政治制度、各国政治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按照他自己的话就是“做革命理论的研究，探索中国革命的法子”。

在国外游历考察期间，邓演达坚持结合中国实际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坚持广泛联系同志，探讨革命问题。邓演达在国外游历考察的近3年时间里，先后到了苏联、德国、挪威、意大利、英国、法国、瑞士、奥地利、匈牙利、南斯拉夫、保加利亚、土耳其、伊拉克、叙利亚、印度等不同类型的欧亚国家，一方面博览群书学习研究，一方面深入基层调研考察，了解这些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情

况，以及工人、农民、市民的生活情况，做了大量的笔记，积累了大量知识，为寻求中国革命道路，锲而不舍，勇于探索，形成了他的“平民革命”思想，创立了“平民革命”理论。

### 邓演达“平民革命”理论的主要内容：

关于哲学思想：坚持唯物论和唯物史观。

关于中国社会的性质：中国是一个处在前资本主义时代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因此，可以不必经过资本主义革命，不必在形成发达的资本主义之后再进入其它社会形态。

关于中国革命的性质：是带有民族性的平民革命，其实质是农民革命、土地革命。

关于中国革命的任务：是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地主阶级统治，建立以工农为重心的劳动者政权——平民政权。

关于中国革命的前途：通过国家资本

主义，最终实现社会主义。

邓演达“平民革命”理论，体现在农工党第一次全国干部会议通过的政治纲领《我们的政治主张》中。按照邓演达的说法，党纲的核心可以归纳为三句话：“解放中国民族，建立平民政权，实现社会主义”。

邓演达的“平民革命”思想，是继承孙中山“三民主义”思想基础上的发展。邓演达的“平民革命”思想，有旧民主主义革命因素，也有新民主主义革命因素，有较强的革命性和进步性。邓演达要建立的新的革命政党，不完全是代表小资产阶级利益的政党，基本上是延续了孙中山改组后的中国国民党的四个阶级（即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联盟性质。但邓演达强调要以“工农为重心”。

邓演达的追随者和战友、农工党中央原主席季方，在回忆与邓演达共同建党的历史时说：“邓演达的许多革命主张和实

践，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他对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前途的分析都是正确的。”

## 中华革命党的活动

《莫斯科宣言》发表后，爱国反蒋力量受到很大鼓舞，认为“有了希望”、“有了法宝”。1927年冬至1928年春，谭平山、章伯钧、朱蕴山、李世璋、郑太朴、张曙时、季方、马哲民、邓初民、王枕心、肖秉章、连瑞琦、丘学训、包惠僧、黎明、孙靖华、黄慕颜、江董琴、赵舒、张申府、丘萼华、戴盆天、陈豹隐等，陆续来到上海，他们“要求民族的生存，要找革命的出路”，尤以谭平山、章伯钧最为积极，为把大家联络组织起来多方奔走。从此，相互间的往来更加频繁，几乎每周六都是数人相约，或在英租界同孚路谭平山寓所，或到法租界萨坡赛路黎锦晖住宅，秘密集会，商谈组党问题。

当时，上述人士对《莫斯科宣言》的

原则精神均表示赞成，唯涉及党的名称，则出现了各种意见。章伯钧等主张叫“中国农工党”，朱蕴山等提出叫“中国工农民众革命委员会”，张曙时等认为搞组织主要是行动，不在形式，赞成邓演达的“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谭平山认为，孙中山先生在民国二年毁党造党，恢复革命，我们还是仿效孙中山先生的做法，成立“中华革命党”。其时大多数人也觉得国民党的名声已经很臭，因而对谭平山的意见没有异议。随后，谭平山即将讨论的意见分别写信告诉了在莫斯科的邓演达和在香港的彭泽民。

“中华革命党”的名称初定之后，公推谭平山起草《党纲》和《政纲》，并开始以“中华革命党”的名义和“科学的三民主义”的主张，首先在上海进行活动。

中华革命党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至1928年初已处于萌芽状态。但在当时的白色恐怖加“四面受攻”的严重处境中，行动极端秘密，凡事都由少数核心人物碰头

商议。所以，中华革命党始终未经召开会议正式成立，只是由谭平山、章伯钧、张曙时、朱蕴山、李世璋、郑太朴、丘学训、王枕心、马哲民、邓初民等一部分人，推选谭平山、章伯钧、张曙时等人组成主席团，在邓演达回国前由谭平山作为总负责人主持全面工作，秘密中央机关设在上海福熙路国民里 14 号，由戴盆天夫妇住二楼看守。此外，部分人还各有其负责联系的地区，如章伯钧联系北平，张曙时联系江苏，王枕心联系江西，黄慕颜联系四川，等等。

从 1928 年开始，中华革命党陆续在上海、北平、南京、江苏、四川、山东、江西、福建、安徽、天津和东北三省等 10 多个地区开展革命活动。初期的工作计划主要是：1、建立中国革命的理论，以指导革命行动；2、在地方建立据点，恢复各地原有国民党左派的组织；3、向文教界突破发展组织，联络青年学生，造成反蒋声势，推动反蒋斗争；4、利用军阀混战，联络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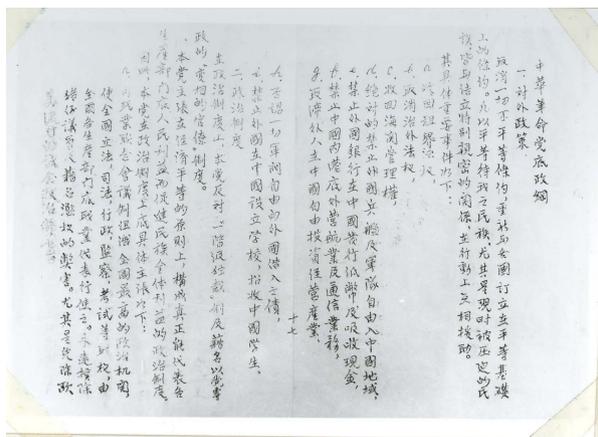
蒋军队，策动反蒋运动。

1928年5、6月间，中华革命党在上海已渗入各个大学，发展和联系了大批青年学生，同时又受到各种政治集团的围攻。为了回答各方面的攻击并加强青年工作，接连创办了《突击》、《灯塔》周刊，周刊在上海、北平以及江浙等地颇有影响。还先后在上海法租界开设了“爱的书店”、戈登路海防路口开设了“晨曦书店”，作为秘密销售书刊、发送宣传品以及其他进步书籍的据点。在注重青年工作的同时，也很重视军事工作。大革命失败以后，不少流亡到上海的黄埔毕业生，如黄雍、俞墉、余洒度等，大都参加了中华革命党，专事联络黄埔同学，策动反蒋，并为以后成立“黄埔革命同学会”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随着工作的不断开展和影响的逐渐扩大，面临的斗争也更加激烈，在白色恐怖下，一些地方的组织遭到反动当局的摧残陷于瓦解。至1929年下半年，中华革命党

的处境已日益艰难，活动很难打开局面，遂商定请邓演达回国主持。

中华革命党延续两年多的时间，有名称、有纲领、有活动，是一个未经正式成立的处于筹备阶段的组织，为正式建党打下了组织基础。



图为 1928 年春，由谭平山起草的《中华革命党底政纲》第一页。《政纲》主张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与被压迫民族结成亲密的关系；反对官僚制度，在经济平等的原则上构成促进民族全体利益的政治制度；建立超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

## 邓演达回国主持建党

1930年5月初，邓演达由欧洲经印度加尔各答到达香港，在香港与彭泽民、丘萼华等会晤商谈了组党问题，旋即秘密回到上海，即着手建党的各项工作，起草政治纲领等。其时争论比较多的是党的名称以及政治纲领中的一些问题。

首先，邓演达与中国共产党联系，希望同中国共产党建立反蒋的联合战线。但当时因受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的影响，中国共产党党内的“左”倾错误路线把民族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当作革命的对象，邓演达的提议未被理睬。多年后周恩来回忆说：“1930年邓演达回国后，曾找我们谈判合作反对蒋介石，可是我们没有理睬他。”

关于党的名称问题，讨论中有多种意见。邓演达主张：现在国民革命的任务尚未完成，孙中山的主张还未实现。要继承孙中山的旗帜，就要继承孙中山的组织。而且当务之急是反蒋，需要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尤其是一些具有革命思想的

现役军人，多年受过国民革命思想的熏陶，也不满于蒋家的反动统治，这是可以大加利用的。所以，国民党这块旧招牌，还有一定的用处。最后，多数人同意沿用《莫斯科宣言》中提出的名称，定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并说明待将来取得政权后，还可以更改。但个别同志，如黄子谷、黄慕颜等，力主彻底抛开国民党。

关于党的政治纲领问题，在理论上遇到了两种不同意见的争论。为充分听取各方意见，邓演达一边起草，一边就党纲中的重大问题，如中国社会的结构、中国革命的性质、未来政权的性质，以及土地政策、外交政策、经济政策、文化政策、社会政策等，每周六在辣斐德路翁洲饭店进行讨论。讨论前后持续了两个月，参加的人员除邓演达、郑太朴、李世璋、章伯钧、谢树英、万灿、罗任一等，有时还邀约陈翰笙、杨杏佛等人参与。

政治纲领经过多次讨论，互相补充，互相让步，五易其稿后，意见大体上趋于

一致。同时讨论了党的中央领导机构人事等问题。诸事初定之后，便决定在上海召开党的成立大会。同时，在有中华革命党的组织基础和革命同志人事关系的地方，着手筹建地方组织。



1930年，鄧演達回國組黨時攝于上海的照片。上面題寫的內容，闡述了鄧演達關於革命任務、革命對象、革命盟友等方面的重要思想觀點。

## 4、中国农工民主党第一次全国干部会议

1930年8月9日，邓演达在上海法租界萨坡赛路290号（著名流行音乐家黎锦晖的寓所，今黄浦区淡水路332弄1号），主持召开了有10个省区的代表参加的全国干部会议，宣告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即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前身）成立。

出席会议的有邓演达、黄琪翔、章伯钧、季方、郑太朴、朱蕴山、李世璋、郭冠杰、丘哲、潘震亚、杨树松、黎明、江董琴、王枕心、罗任一、万灿、谢树英、詹显哲、丘学训、丘萼华、杨逸棠、黄昌、庄明远、肖秉章、赵舒、漆其生、黄慎之、区克宣、黄中厘、李毓九、邹兰甫、张资平等三十余人。

邓演达首先致词，他说：“中国革命已经到了绝续关头，继往开来的重任，落在我们肩上。在座各位都是在革命战线上奋斗过来的同志，更感责无旁贷，所以挺身

而出，重上战场。”邓演达在强调“军事第一”的主张之后说：“今天是我们战斗的开始，是继续孙中山先生革命事业向前奋进恢复中国革命整齐步伐的第一步。现在请大家起立，向孙中山先生革命以来的先烈们致敬！”

与会者静默致敬。

之后，邓演达宣读了《我们的信条》：

（一）我们的哲学观点是历史的唯物主义；

（二）我们的事业是继续孙中山的革命；

（三）我们的任务是实现中国平民革命，解放全中国，向社会主义大道前进；

（四）为实现中国革命，联合世界上被压迫民族共同奋斗；

（五）我们是信仰一致、组织一致、行动一致的政治结合的战斗团体；

（六）我们采取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

全体一致通过《我们的信条》。

接着通过了由邓演达起草的政治纲领——《我们的政治主张》。之后，全体起立，互行鞠躬礼。

会议选举了中央领导机构——中央干部会，由 25 人组成：邓演达、黄琪翔、章伯钧、彭泽民、季方、丘哲、郭冠杰、郑太朴、朱蕴山、李世璋、丘学训、陈豹隐、江董琴、肖秉章、丘萼华、潘震亚、詹显哲、杨逸棠、谢树英、万灿、罗任一、王枕心、杨树松、李毓九、邹兰甫。其中，彭泽民和陈豹隐两位同志没有出席会议，仍被会议选为中央干部会干事。

邓演达被推选为中央干部会总干事。

会上宣布了中央机关各工作部门的名称和人选，即按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在中央干部会之下设立各个委员会，每个委员会设主席委员一人（有的设副职），委员 5 至 7 人。计有：组织委员会，主席委员郑太朴；宣传委员会，主席委员章伯钧；设计委员会（后改为军事委员会），主席委员黄琪翔，副主席委员季方；民运委员会（负

责工运、农运、青运工作)，主席委员李世璋；财务委员会，主席委员季方，副主席委员罗任一；侨务委员会，主席委员彭泽民。（8月23日，中央联席会议第二次会议决定增设训练委员会，邓演达兼任主席委员）。

会议从晚19时开到22时。

全国干部会议通过的党纲《我们的政治主张》，贯彻了邓演达“平民革命”思想，其核心内容就是“解放中国民族、建立平民政权、实现社会主义”。邓演达特别强调从国情出发，在莫斯科考察调研时就认为俄国革命的经验不适合中国，党纲特别强调：“我们反对欧美流行的三权分立制”。党纲设计的蓝图是：推翻蒋介石政权，建立以工农为重心的平民政权，把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贯彻到底。

全国干部会议的召开，标志着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正式成立。8月10日，中央干部会向全党发出第一号通告。通告

说：“民国 16 年（公元 1927 年）7 月以后，整个的中国国民党已尽为反动势力所占据。”“现时南京的统治已明白的投降了帝国主义，已完全成为腐朽官僚的分赃机关。”“改组派的改组，实在只是改换主人，去组织联合的反动政权。”“在这样的局势下面，我们的革命孙中山主义者，应该加紧的团结起来，把革命的孙中山主义纲领认清，去继续进行革命。”

通告宣称：“本会受各省区革命同志的付托，已于本年 8 月 9 日重新集会，决定临时中央干部，并决定行动纲领。以后凡属本党忠实同志应即本此行动纲领坚决的向前奋斗。”

通告号召：“我们要求忠实的革命同志，在统一的意志及严密的组织下面去行动。本干部会受各地同志的付托也必须努力以求责任的完成。务使于最短期间把反革命的统治推翻，革命的势力扩大，革命的纲领推行。并希望于最短期间得到新的革命根据地，把革命的本党同志重新集合

起来，建立正规的中央，以完成孙中山主义革命的使命，使中国民族完全解放，人民直接掌握政权，实现社会主义的建设。”

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成立后，中央秘密机关暂设在爱麦虞限路 159 号(今绍兴路 41 号)，邓演达、季方等常驻此办公。中央各部门亦分别租房设立秘密工作机关，如组织委员会设在麦根路 32 号，宣传和民运两个委员会设在爱文义路冠生里 1389 号，财务委员会设在西摩路威海卫路 741 号。此外，愚园路愚园坊 20 号、霞飞路和合坊 57 号，也是邓演达等主要负责人经常集会和工作的场所。



图为农工党第一次全国干部会议的会址(原上海法租界萨坡赛路 290 号,今上海市黄浦区淡水路 332 弄 1 号)。

## 二、开展以推翻蒋介石政权为目标的革命活动

### 1、建党后全面开展倒蒋斗争

农工党成立后，即从组织建设、宣传、民运、军事、人才培养等方面全面开展倒蒋斗争，开展以推翻蒋介石政权为目标的革命活动。

发展和壮大党的组织。确定组织工作的重要任务，是建立一个集结革命力量的组织，建立一个行动的组织，建立一个短小精干的组织。并规定党员“要以工农分子为主体，必须时刻努力去尽量吸收工农参加组织”。在20个省市建立并开展组织活动，分为中央区：上海、南京、江苏、浙江、安徽5个省市。北方区：北平、天津、河北、山东、山西、西安、兰州、绥

远、察哈尔 9 个省市。南方区：广东、福建、江西、湖南、湖北、四川 6 省和香港。

开展宣传和民运工作。农工党中央制定了《宣传大纲》，创办了中央机关刊物《革命行动》杂志、《行动日报》等刊物，邓演达带头撰写发表文章，目的在于唤起被压迫被剥削的平民群众，在革命的纲领下面团结起来。民运工作方面，农工党中央先后组建了现代青年社、全国农民解放同盟、全国工人俱乐部、全国商业协会、中国教育建设协会、现代学术研究社和国民会议期成会（“期成会”相当于现在的“促进会”）等群众组织，并指示各地方组织成立民运工作机构，组织和指导当地的民众运动。

把武装斗争作为夺取政权的根本手段。邓演达强调“军事第一”，强调中国的革命斗争必然的要以武力抗争的形式展开起来，军事运动必须与群众运动相结合，军事必须听从政治，接受党的领导。邓演达亲自拟定《军事运动方针》。对现役军

人，包括黄埔出身的、保定军校和各地讲武堂出身的、以及各军事教育机关出身的，也包括土匪等等，都根据实际情况，分别提出了具体对待办法。对全国各地的军事力量的种类、派别、实力、驻地、训练、装备等，都做了调查统计，并要求驻在该地的党员随时报告。

组建“黄埔革命同学会”。在邓演达的亲自指导下，“黄埔革命同学会”于1930年11月在上海成立，主要任务是联络和组织第一、二、三、四、五期的黄埔同学。总会会址设上海法租界辣斐德路桃园新村8号，创办《黄埔》周刊。全国组织划分为三个区：珠江流域为南方区，长江流域为中央区，黄河流域为北方区。区设执行委员会。区以下设省、市分会，先后在18个省、市设立了分会或支部。分会之下设小组。在发展组织的同时，着重打入各个反蒋集团，如冯玉祥、阎锡山、杨虎城、高桂滋、何成濬等的部队中，工作进展相当迅速。到1931年夏季，会员人数以及受到

这一组织影响的黄埔各期学生，共达 5、6 千人。许多黄埔生认为：蒋介石拿我们做革命本钱，他成功了就不管我们的死活。今天邓先生再来领导我们革命，就是我们唯一的出路。黄埔革命同学会声势壮大，组织遍布，使黄埔学生发生了激烈的分化，震撼着蒋介石的反动统治基础，动摇了蒋介石对黄埔学生的控制。

联络各地的反蒋军事力量。邓演达利用其与国民党军队的历史关系以及蒋介石嫡系与非嫡系的矛盾，在国民党军队中进行联络和策反工作，如陈诚、陈铭枢、杨虎城、邓宝珊、冯玉祥、阎锡山、郅子举、郭汝栋、孙震、邓锡侯、李家钰、刘湘、卢兴邦、胡伯翰等军事将领，他们或亲自，或派代表到上海同邓演达联系，有的表示愿意响应、配合邓演达起义，有的参加了农工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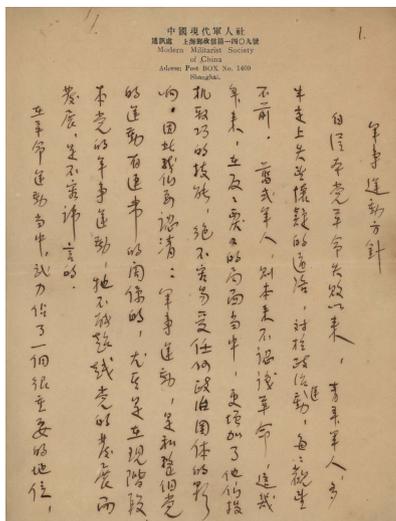
以上的各项工作，都是积极有效的。经过组织联络，至 1931 年夏，拟响应武装起义的反蒋力量已有相当规模，各项武装

起义的准备工作也渐次就绪。农工党中央成立了军事委员会，制定了武装起义计划，决定由邓演达任起义总指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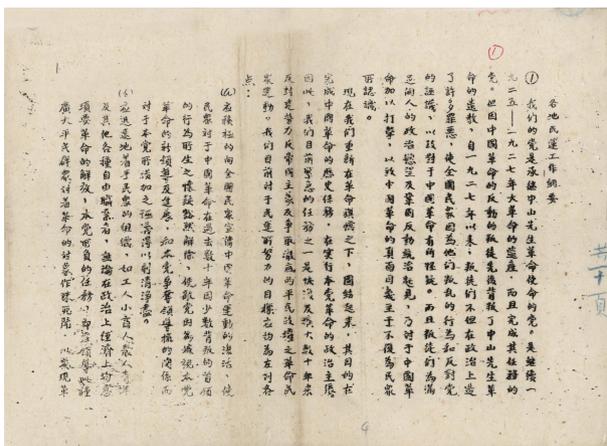
1931年2月，蒋介石扣留国民党粤系元老、立法院长胡汉民，汪精卫、孙科等在广东地方实力派陈济棠等的支持下，5月在广州另立国民政府，与南京国民政府相抗衡，引发“宁粤危机”。1931年6、7月间，邓演达与陈铭枢、蔡元培三人密约，商议利用此机会，在南方建立反蒋“第三势力”政权。计划如果蒋命陈铭枢率部调解“宁粤危机”，则借机率19路军从吉安经太和、赣州回广东，占领广东东江和福建闽南一线。同时，陈诚率领18军在驻地江西临川、清江一带起义，夺取南昌。武汉、西安、河南、华北、福建等地所有联络好了的部队一齐响应。推蔡元培领衔，发表对时局宣言，呼吁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在南方建立反蒋基地。

陈铭枢在回忆“三人密约”时叙述道：“我认为蔡元培有政治威望，择生（邓演

达)有群众基础,我有军事力量,我三人合作计划实现,定可另开一新局面。”



图为邓演达亲自起草的《军事运动方针》第一页。



图为农工党中央制定的《各地民运工作纲要》  
第一页。

## 2、邓演达殉难，武装起义受挫

至 1931 年上半年，农工党的组织活动和起兵准备已有一定的成效，在社会上产生了相当的影响，反动统治者的恐慌及对它的嫉恨也随之加剧。蒋介石派王柏龄到上海，与淞沪警备司令熊式辉合谋侦察农工党的活动，并悬赏 30 万元缉捕邓演达。

当时情况十分险恶，很多同志都为邓演达的安全担心，力劝邓演达暂时离开上海以避风险。邓演达为了回答同志们的关怀，激发全党的斗志，在农工党中央的《政治通告》中写道：“革命是站在大众面前为大众而牺牲的事。在此反动极盛的局面之下，为农工平民大众而斗争，随时准备着被捕，随时都必须准备着被残杀。”所以，邓演达总是本着工作上需要坚持，行动上力求审慎的态度，一直没有离开上海。

1931 年 6 月间，在农工党上海市组织负责整理和分发文件工作的陈敬斋，因作风问题被调往福建工作，他拒不受命，由

对前途悲观，而思卖党求荣，乃以知道邓演达的行踪为投靠条件，直接向在南昌行营的蒋介石写告密信，接着便同特务密谋待机行动。8月15日，淞沪警备司令部已将农工党中央及各部门的机关地址侦察清楚，并发出了逮捕邓演达、季方、罗任一、沈维岳、丁丁、杨允鸿等的拘票。

1931年8月17日下午1时，邓演达在上海愚园路愚园坊20号对江西起义干部训练班学员讲课，参加者有经北平、江苏组织保送的学员9人，还有中央财务委员会副主席委员兼上海组织的负责人罗任一。陈敬斋事先探悉在上海举办训练班，给上海组织写信要求听讲，经允许，到会听了未及1小时，便佯称腹痛请求离席，主持人未保持警惕，准他离去。陈走后即奔向特务告密，约在下午3时，淞沪警备司令部侦察队长邓警铭带领一群特务，会同公共租界总捕房中西包探，将愚园坊20号房屋团团包围，在训练班讲堂里的邓演达、罗任一、邓维亚、周竞西（女）、刘奎、

王宾荪（女）、金福光、黄锦耀、王素清、方矩、张昌 11 人全部被捕。同日，在中央各机关，西摩路威海卫路 741 号罗任一住处，愚园路 612 号大同印刷所，辣斐德路桃园新村 8 号“黄埔革命同学会”总会等，沈维岳、郑太朴、余洒度、俞墉等 20 余人被抓走。

邓演达等被捕后，全党上下都把营救邓演达及所有被捕同志，作为自己的重要使命。农工党中央举行了有邓演达的胞兄邓演存参加的紧急会议，推举朱蕴山主持营救工作。当时，国民党中央军校武汉分校的教育长胡伯翰等十分焦急，派曹金轮到沪，建议劫狱。南京的樊少卿也义愤填膺要求劫狱。南京教导总队的邓克敏（黄埔生），还自发组织了武装营救队，不幸事败，被蒋介石通缉。10 月间，许源圃（黄埔生）从南京潜往上海，向朱蕴山提出了营救的具体计划。为了实现营救计划，朱蕴山特地从上海迁居南京，并派何自坚、张朴、韩尚真等前往南京开展工作，租下

了营救邓演达出狱后用于临时转移的住所。营救准备工作正在进行，不料蒋介石又将邓演达转移关押，因而计划未能实施。

邓演达被押到南京之初，蒋介石授意陈立夫派主持国民党东北党务的南京国民政府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齐世英出面，劝邓演达与蒋合作，被邓演达严厉驳斥。不久后，蒋介石又派五四运动学生领袖、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次长段锡朋以私人关系找到谢树英，要求谢树英写信劝邓演达与蒋合作，谢树英拒绝了段锡朋的要求。“九一八”事变以后，蒋介石再派人劝邓演达，提出要邓演达公开声明取消组织，即任命邓演达为“剿匪”副总司令，遭邓演达严词指斥。最后，蒋介石在下野之前，又命陈立夫派黄埔军校第6期毕业生、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的李熙元见邓演达，要求在蒋介石下野期间，邓不写反蒋文章，即可获释。邓演达说：我写反蒋文章，不是我邓演达要写，是中国人民要我写。

一方面是连番对邓演达进行诱降，另一方面则是何应钦、何健等人联名致电蒋介石要求处死邓演达，诬称“邓演达在武汉时期为共产党张目，现又背叛党国，此人不除，不足以安天下，慰党国”。号称党国理论家的戴季陶也向蒋介石进恶言：今天可怕的敌人，不是汪精卫、陈济棠，真正能动摇政府根基、分散黄埔力量的，只有邓演达一人。

“九一八”事变后，宁粤议和，蒋介石被迫下野。由于邓演达在黄埔系军人及国民党左派中深孚众望，且被捕以后又坚贞不屈，蒋介石担心邓演达领导的革命力量会成为蒋家统治基础的威胁和自己卷土重来的障碍。因此，蒋介石在下野之前，命其侍卫长王世和于1931年11月29日深夜率领一排卫士，秘密将邓演达押至南京麒麟门外沙子岗残酷杀害。邓演达时年36岁。

1931年12月初，邓演达被害的消息才泄露出来。农工党派人向京沪卫戍司令陈

铭枢打听虚实。陈一脸茫然，回答说：要是被杀，我是会知道的。12月14日，宋庆龄从何应钦的部下得到传言后赶赴南京见蒋，得知邓演达确已被杀害，宋无比愤慨，一手把蒋客厅的茶几掀翻。12月20日，宋庆龄在《申报》发表宣言，严厉谴责蒋介石**残害忠良的反动罪行**，并表示“深信中国之真正革命者，必不因反动势力之恐怖残杀而消极畏缩。且将因环境之压迫，民众之呼号，而益坚其牺牲奋斗之志，不顾一切，共进于革命之大道”。《宋庆龄宣言》的发表，是对反动势力的有力鞭挞，是对农工党同志的极大鼓励与支持。

12月16日，农工党发出《中央通告》，号召全党：“在悲愤、惨痛中接受邓同志的遗教，坚实我们的团结，巩固我们的组织，整齐我们的步伐，一致携手，踏着先烈光荣血迹前进，剿灭我们的敌人，完成我们神圣的事业。”

证实邓演达被害后，经陈铭枢差人寻获遗体，但已模糊不能辨认，只有所穿棉

衣可证。乃由陈铭枢出资具棺殓，重葬于南京麒麟门外小营岗（在殉难地沙子岗附近），并题写碑文：故友邓择生先生之墓。

蒋介石下野后，南京国民政府由孙科出面组阁，经宋庆龄联合冯玉祥等作保，和邓演达一同被捕的郑太朴、罗任一等 11 位同志于 1932 年 1 月 6 日获释出狱。他们在被关押期间，都表现得十分坚贞，没有辜负组织的信任和邓演达的期望。



1931年8月17日，邓演达在上海被捕。18日被解送到设在公共租界内的“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审讯”。图为“审讯”结束后邓演达（右一）被押送走向囚车。

### 3、鼓动和支援“一·二八”淞沪抗战

邓演达被捕以后，农工党的领导顿失核心，中央机构陷于瘫痪，很多干部遭到迫害，地方组织大多瓦解，一时呈现出纷乱的状态。经过一番波折，1931年11月间，经商定暂由黄琪翔负总责，自此局面渐次安定，并逐步恢复活动。黄琪翔主持中央后，根据实际情况，开始有重点地整理组织，主要是改组上海组织，加强北方组织，重建南方组织等。

“九一八”事变后，对于日寇的武装侵略是抵抗还是退让，是当时全国人民同蒋介石集团斗争的一个焦点。全国人民对日寇的侵略罪行和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义愤填膺。1931年9月22日，中共中央发表了组织反帝运动的决议。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和推动下，全国各地群众掀起了抗日反蒋的怒潮。农工党中央明确提出：

在这种内外斗争的旋涡中，我们最重要的政治口号就是“倒蒋抗日”。

1931年冬，19路军由赣南调驻京（南京）沪一带，日寇正欲进攻上海，中日关系日趋紧张。当时农工党领导人黄琪翔也居住在上海，同19路军军长蔡廷锴往来密切（邓演达、黄琪翔与19路军将领陈铭枢、蔡廷锴、蒋光鼐等，均来自孙中山创建并直接领导的军队“援闽粤军”第1师。之后，第1师发展为国民革命军第4军，第4军在北伐战争中被称为“铁军”。第4军的一部分之后又逐步演化发展成19路军）。1932年1月下旬，日寇在上海闸北寻衅，形势一触即发。蔡廷锴同黄琪翔商议对策，黄琪翔力主19路军抗日。而南京政府何应钦则电令蔡廷锴：“退出上海市区，以免冲突”。1月28日晚，日寇先后在闸北、江湾、吴淞等处大举发动进攻，19路军奋起抗击，“一·二八”淞沪抗战打响。战事爆发后，黄琪翔亲赴前线协助指挥作战，并动员87师、88师黄埔出身的军官主动请

战。农工党组织了“义勇军”，编入 19 路军补充团参战，固守太仓城。农工党组织了“后援队”，为 19 路军提供物资支援。农工党还创办了《自卫》杂志、《上海闷葫芦报》，揭露日寇罪行，鼓舞军民抗日。因得不到增援，19 路军面临弹尽援绝，农工党员杨建平在交通部邮政储金局工作，挪用该局巨额资金支援 19 路军。农工党员王亚樵组织的“铁血锄奸团”，专门袭杀日寇和汉奸。得知日寇准备于“天长节”（4 月 29 日昭和天皇生日）在上海虹口公园举行“淞沪战争祝捷大会”，19 路军将领与王亚樵等决定借机实施暗杀行动。经王亚樵精心策划，密派杀手于 4 月 29 日潜入会场，成功引爆特制手雷，炸毙侵华日寇上海派遣军司令官白川义则大将，炸死炸伤日寇军政要员 13 人。

19 路军高举抗日救国旗帜，英勇奋战，展现了中国人民英勇抗敌的不屈精神，给日寇以沉重打击。但是，1932 年 5 月 5 日，南京政府派员与日寇进行谈判，签定了丧

权辱国的《淞沪停战协定》，激起了全国人民极大愤慨。为此，农工党发动学生、工人进行抗议，在农工党员严正的带领下参加了痛打国民党首席谈判代表郭泰祺的行动。

#### 4、参与策动“福建事变”

《淞沪停战协定》签订后，19路军被调往福建“剿共”，并指令由海路从漳州、厦门登陆。蔡廷锴担心遭蒋介石暗算，请黄琪翔协助了解漳州、厦门一带的军情。黄琪翔电令在福建的陈祖康急速赴沪汇报。陈祖康感到事关军事要情，赴沪面请黄琪翔另派军事专员前去视察。黄琪翔派陈祖康、周士第、邓次侯3人，利用邓次侯与邬汉屏（驻漳州中央军49师副师长）的同乡友谊关系，由邬汉屏接待，名为游览名胜古迹，实为察看漳、厦一带的军事部署情况。之后，经综合分析，陈祖康、周士第、邓次侯3人电告黄琪翔“转告19路军，可以安全入闽”。

19路军入闽前，黄琪翔在与蔡廷锴交换意见时，取得“不抗日不足以图存，不反蒋不足以抗日”的共识。农工党中央干部会干事李世璋对蔡廷锴说：“19路军抗日，

名誉满天下，现在你只有联共反蒋抗日，就可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就有办法。”

19 路军入闽后，黄琪翔打算利用这个机会，与蔡廷锴等建立反蒋联盟，并将福建作为农工党进一步恢复发展的基地。1932 年冬至 1933 年，农工党员从四面八方来到福建，会同在福建的党员，计有 100 多人，党的骨干分子绝大多数都到了福建。经蔡廷锴、蒋光鼐同意，并由 19 路军总部秘书长、农工党员徐名鸿安排介绍，到达福建的农工党员分别在福建各地担任行政工作、农村工作以及协助 19 路军开办军官训练班等。原在 19 路军担任军职的，尚有旅长云应霖、团长周士第、团副汪志道、参谋沈奎、营长何自坚等。在地方担任军职的，有钟绍奎、马鸿兴等若干人。

1933 年 6 月，彭德怀率领的中国工农红军东方军入闽后，19 路军主力在闽西北受到猛烈打击，损失惨重。黄琪翔等遂于 8 月底在上海寓所宴请刘伯垂、章伯钧、彭泽湘、麦朝枢等农工党同志，共商闽局。

大家一致认为：无论于公于私都要设法挽救 19 路军。19 路军只有和中共取得联系，商谈合作，反蒋抗日，才有立足生存之可能。于是决定由黄琪翔写信向在香港的陈铭枢征求意见，然后安排农工党员在上海找中共联系，但没有结果。9 月中旬，陈公培（又名吴明，农工党员）受 19 路军将领委派，携带蒋光鼐、蔡廷锴联名写在绸布上的致毛泽东、朱德的信，前往闽西北交战前线寻找红军。东方军司令员彭德怀在延平（南平）王台会见陈公培并进行谈判。陈公培对红军提出的停战条件没有异议。彭德怀给 19 路军将领写了回信，并请 19 路军再派人到瑞金同中共中央谈判。王台谈判之后，19 路军和红军双方在闽西北前线处于休战状态。

10 月 18 日，徐名鸿以“福建省政府及 19 路军全权代表”身份，携带 19 路军将领的信件，由陈公培陪同，前往中共中央驻地瑞金，受到毛泽东、朱德等中共领导人的接见并宴请。10 月 26 日，徐名鸿与潘健

行（潘汉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及工农红军全权代表）代表双方签订了《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11条）。协定的签订使19路军正式走上了联共反蒋抗日的道路，并使19路军解除了在福建发动建立反蒋抗日革命政府的后顾之忧。

10月下旬，农工党黄琪翔、章伯钧、麦朝枢等，应李济深、陈铭枢的邀请，从上海赴香港，在李济深家开会讨论发动建立反蒋抗日革命政府事项。参加会议的人员还有蒋光鼐、徐谦、张文，以及冯玉祥的代表余心清、阮墨林等。会议讨论了有关军事、政治、财政、外交等具体事宜，决定在香港的人员分批赴福州进行筹备活动。

11月上旬，农工党黄琪翔、章伯钧、郭冠杰、丘哲、麦朝枢、刘伯垂、王亚樵等陆续到达福州。农工党中央机关设在黄巷32号黄琪翔的住所。章伯钧在福州向黄农（农工党员）通报农工党将要参加发动

建立反蒋抗日革命政府，要求凡属农工党员均须来福州集合。于是，黄农通信召集闽籍同志来榕，并恢复农工党福建干事会，由丘锦章负责组织，余遇时负责宣传，黄农负责训练，郑少雄驻会。干事会会址设在中山社12号。

11月18日，黄琪翔和李济深、陈铭枢、蔡廷锴、蒋光鼐、陈友仁、徐谦、李章达及19路军各军军长、总参谋长等在福州鼓山喝水岩“迴龙阁”召开紧急会议。会上对发动建立反蒋抗日革命政府的各项相关工作进行了全面的讨论。关于发动事变的时间发生了争论激烈。黄琪翔表态：“今日之事只有备战一途，过去阎、冯反他（指蒋介石），被讨伐到底。如今我们联共反他，蒋必全力来犯。与其不战而屈，不如战而败！干革命成败利钝在所不惜，为千秋后世计，应立下决心，速即发出讨蒋电，以

争取外援。”鼓山会议是一次决定性的会议，对发动事变时间、方式及新政府的纲领、政策等重大问题作出最后决定。黄琪翔代表农工党坚定的反蒋立场，推动了发动“福建事变”的进程。会议至18日深夜结束。

11月20日上午，“中国全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在福州南校场（今五一广场）召开。参加会议的有来自全国26个省市的代表和华侨代表100多人，以及19路军官兵、人民群众等10万多人。大会主席团由黄琪翔、徐名鸿、何公敢、刘剑米（刘伯垂）、梅龚彬、彭岳渔（彭泽湘）、李章达、章伯钧、余心清等17人组成，黄琪翔被推选为主席团主席，主持大会。黄琪翔致开幕词，宣布大会的宗旨是“救护国家，保障人权”。为实现此目的，“必然排除帝国主义的侵略，打倒卖国媚外的蒋介石，和他御用的南京国民党政府”。黄琪翔宣读了《中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人民权利宣言》，

并获得大会一致通过。大会还通过《即日组织人民革命政府案》和《制定新国旗案》。随即举行升旗仪式。

11月22日，“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正式成立，改年号为中华共和国元年，国旗为上红下蓝中嵌一颗黄五星。人民革命政府设军事、经济、文化三个委员会，财政、外交两个部，以及最高法院和政治保卫局等。农工党人在人民革命政府中担任重要职位，其中，黄琪翔任军事委员会委员兼参谋团代主任，彭泽湘任人民革命政府秘书长，章伯钧任文化委员会委员、经济委员会委员兼经济委员会所属的土地委员会主任委员，郭冠杰任延建省副省长（人民革命政府将控制的区域划分为4省2市：闽海省、延建省、兴泉省、龙汀省、福州特别市、厦门特别市）。人民革命政府成立后，派尹时中为代表驻在瑞金，中共方面也派张云逸为代表驻在福州。

“福建事变”受到各地民众和海外华侨的拥护。但“福建事变”遭到蒋介石的

军事镇压。在蒋介石分化瓦解和优势兵力的攻击下，“福建事变”于1934年1月终告失败。

策动“福建事变”是农工党继承邓演达遗志的一次重要实践。“福建事变”的失败，不仅使农工党再次遭受巨大损失，而且证明“团结国民党左派，打击国民党右派”的设想难以实现。要抗日，蒋介石不让。要反蒋，力量又不够。如何继续孙中山的革命事业，农工党同志陷入了迷茫。

1934年2月间，“福建事变”失败后陆续转移的农工党领导人在香港集会，决心按邓演达的政纲继续战斗。为积蓄革命力量，决定采取缩小目标、分兵各路策略，分头在国内外进行活动。章伯钧、何世琨、李士豪、郭冠杰等东渡日本。黄琪翔、万灿、连瑞琦等西去德国。漆其生等回上海，王一帆、周惠生等到北平，李伯球等留广州，党的中心设在香港，由彭泽湘、彭泽民、丘哲等负责留守，与各方面保持联系。



1933年11月20日，“中国全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在福州南校场（今五一广场）召开，农工党领导人黄琪翔担任会议主席团主席。图中标①②③⑥⑦者分别为李济深、蔡廷锴、黄琪翔、蒋光鼐、陈友仁。



1934年3月21日，农工党负责人在香港举行临时会议，决定按邓演达的主张继续战斗。图为参会者与部分农工党联系的人士合影，前排右起：杨逸棠、郭冠杰、余心清、章伯钧、李健生（章伯钧夫人）、谭芝轩（彭泽湘夫人）；后排右起：杜冰坡、张文、黄琪翔、彭泽民、丘学训、丘哲、彭泽湘（余心清、张文是当时与农工党有密切联系的人士）。

### 三、在抗日烽火中同中国共产党 亲密合作

#### 1、对中国共产党认识的深化

多次的失败与挫折，促使农工党同志在探索民族解放的道路上不断总结经验。

从 1934 年春季起，陆续到达日本东京的有章伯钧、李士豪、李述中、王晞辰、何世琨、何仲珉、郭冠杰、李伯球、李健生、章振乾、丘锷仑、黄日昭、王昆、黄农（已在北海道帝国大学）等 10 余人。他们分成 3 个小组，每周集会一次，讨论交流对国内外政治经济情况的意见。在德国柏林的黄琪翔、连瑞琦、万灿等，积极参加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旅欧华侨抗日联合会德国分会”（总会设在法国巴黎）的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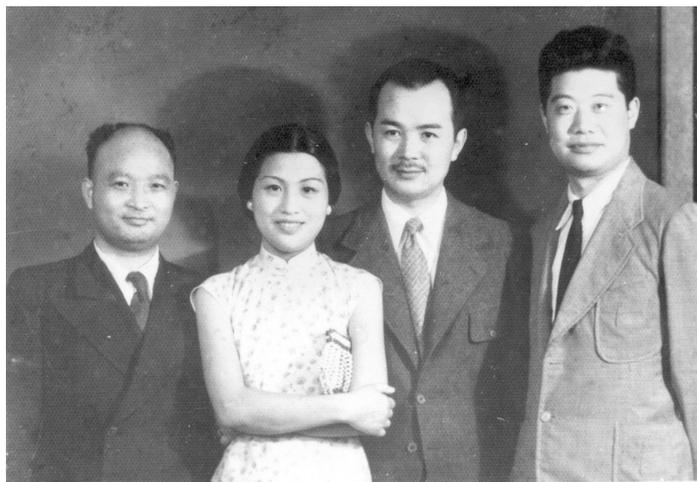
国活动。黄琪翔和连瑞琦先后被推选为该会的负责人，同所谓“留德学生会”的反动组织进行激烈的斗争，并请德国共产党将抗日宣传品译成德文，在连瑞琦寓所印刷，发到德国各地。一天，黄琪翔主持召开有70多人参加的会员大会，国民政府驻德大使程天放竟要求德国警察阻止，并将黄琪翔、朱江户（中国共产党党员）抓走。经全体会员到驻德使馆抗议，程天放迫于压力才不得不打电话给柏林警察当局，将黄琪翔等释放。

1935年夏，在日本的章伯钧、何世琨、李士豪、李伯球、何仲珉、李述中、王晞辰等和所联系的一些朋友到伊东（在日本静冈县）井子头公园，就如何重新整顿组织，发动反蒋抗日等问题进行会商。大家在会商中一致认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革命的主力，但也还要各方面的力量去配合行动，这就是我们要重整组织的目的。会商以后，在伊东办起了《解放》杂志，发表主张团结抗日的文章，联络旅日进步分

子加入农工党。

日寇占领东北三省之后，1935年又制造“华北事变”，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在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的关键历史时刻，1935年8月1日，中共中央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呼吁停止内战，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中共中央《八一宣言》的发表，激起了全国抗日民主运动的高涨，农工党同志深受鼓舞，认为“反日反蒋，事有可为”，并催章伯钧返回香港，准备重振组织，参加抗日民族阵线。

章伯钧在离开日本返回香港之前，将大家会商的意见写信告知在德国的黄琪翔。黄琪翔复信表示赞成，并提出：“共产党是斗争的主力，要搞革命就必须与红军取得联系。”章伯钧与黄琪翔的看法一致。



“福建事变”失败后，农工党负责人黄琪翔等流亡到了德国。图为 1936 年黄琪翔等在柏林合影。左起：连瑞琦、郭秀仪（黄琪翔夫人）、黄琪翔、谢树英。



1935年夏季，流亡到日本的农工党部分领导人、干部及所联系的人士，在伊东井子头公园集会，商讨重振组织问题。图为与会者合影，其中有章伯钧（三排右一）、李世豪（二排右一）、何世琨（三排左一）、李伯球（四排左一）、何仲珉（四排左二）、丘锬仑（二排左三）、郭沫若（三排右二）、田中忠夫（日本友人，二排右二）。

## 2、确立同中国共产党合作的政治路线

1935年秋，章伯钧回到香港与彭泽民、丘哲、郭冠杰等会商后认为：农工党向有社会基础和工作基础，抗日救国，应急起行动，本着过去精神，恢复组织。黄琪翔也从德国来信，赞成恢复组织，并汇来港币3000元，作为筹备经费。

1935年10月下旬，华北的张云川，广东的郭翹然，在日本的李士豪、李伯球、何仲珉等，先后回到香港，共同会商恢复组织的基本问题。讨论的主要内容有：

关于党的路线方针问题。认为中共中央发表了《八一宣言》，第三国际也提出了“反法西斯人民阵线”的主张，我们应当首先响应。章伯钧说：现在中国共产党在法国所做的国际统一战线工作，颇有成效。国内的统一战线，也已渐能团结各个方面，趋向一致。我们应当同中国共产党合作，共同奋斗。

关于党的名称问题。一致认为党的名

称需要改变，既要同国民党彻底决裂，又要适应革命形势的变化，以民族解放为己任，还要照顾到历史传统，保留“行动委员会”的称谓。

关于党的纲领问题。一致同意以邓演达时期的纲领为基本纲领，根据新的历史任务作适当修改，重点突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关于党的指导思想问题。经过讨论，商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党的思想武器。”

讨论告一段落，推章伯钧、彭泽湘、李伯球、张云川起草《临时行动纲领》和《告同志书》，并着手筹备召开第二次全国干部会议（当时称为第一次临时代表会议）。

1935年11月10日，第二次全国干部会议在香港九龙大埔道召开。参加会议的有章伯钧、彭泽湘、彭泽民、丘哲、郭冠杰、李伯球、张云川、李士豪、陈卓凡、杨逸棠、郭翹然、何仲珉、叶粤秀、杜冰

坡、吴今、陈柏麟等 20 余人。会议由章伯钧、彭泽湘、彭泽民共同主持。主要内容是：1、决议将“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易名为“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2、决定响应中共《八一宣言》，以“抗日、联共、反蒋”为党的总方针，以推动抗日为中心工作；3、通过了《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临时行动纲领》和《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告同志书》；4、选出了中央领导机构，黄琪翔、章伯钧、彭泽湘、彭泽民、丘哲、郭冠杰、李伯球、张云川、李士豪、陈卓凡、杨逸棠、郭翹然、杜冰坡、季方、罗任一、何世琨、杨清源、连瑞琦、庄明远等 19 人当选为临时中央执行委员。推选黄琪翔为总书记。并决定在总书记黄琪翔留德期间，党务工作由章伯钧、彭泽湘、彭泽民、丘哲、郭冠杰集体负责；5、决定以北平、上海、广州为据点，建立华北、华东、华南三个大区机构，大力发展组织，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中央机关暂设在香港跑马地。为指导全国工作，编印

《政治通报》、《工作通讯》等油印品。由喻松担任“总交通”，往返传递于香港、上海、北平之间。

第二次全国干部会议确立的同中国共产党合作的政治路线，标志着农工党的重大历史转折，表明农工党完成了认识上的飞跃：不但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中国革命的主力，而且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保证。

1930年农工党建党时，邓演达就曾经主动寻求同中国共产党建立“反蒋的联合战线”，但当时的这种“联合战线”只是把中国共产党作为联合的对象，没有认识到它在中国革命中的领导地位和作用。而且在当时，中国共产党党内的“左”倾错误路线将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列为革命对象，而邓演达被认为是代表小资产阶级的，因而联合的提议被拒绝。当时邓演达曾感慨地说：“看来共产党在左倾机会主义占上风的时候，联合战线是不可能实现的，将来如果毛泽东一派领导，可能实

现，因为他同我对中国农民问题的看法是一致的。”第二次全国干部会议提出的“同共产党合作”有其特殊的含义，就是要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帮助和指导下，“政治上同中国共产党保持一致，斗争中同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边。”

### 3、积极推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 恢复发展组织开展抗日救亡

1935年11月，张云川奉命从香港回到北平，聚集成员传达二干会议精神。1936年春，农工党中央派何世琨到北平，由何世琨、周惠生、张云川、王一帆四人组成华北局委员会，何世琨任书记，周惠生负责军事，以“经文”为代号，领导农工党在北平、天津、山东、河北、河南、绥远、山西的工作。1935年12月9日，北平学生发动了“一二·九”爱国运动，农工党员谭石亭、覃汉川、谢辑明、王守先、李湘若、张祚延、王泰、李雪冰、蒋春信等，在农工党北平市委员会的组织领导下，直接参加了“一二·九”的示威游行和宣传活动。

1936年初，李士豪、何仲珉负责华东区的工作。李士豪等到上海后，首先和留

沪的罗任一、黄农、王寄一等取得联系，随即邀集浙江、江西、安徽、福建等省的干部举行会议，传达二干会议精神，由李士豪、何仲珉、杨清源、欧阳平、施建东 5 人组成华东局领导机构，李士豪任书记。华东局成立后，上海组织称为“特别党团”，由何仲珉、喻松、黄德芳等负责。组织工作从发动群众性的救亡歌咏活动开始，参加者有学生、工人和店员，一般是每个周末在中华职业教育社，或八仙桥青年会，集中教唱救亡歌曲一次。歌声激发了爱国热忱，参加者越来越多，达到五、六千人。在这个基础上，由“暨南大学”学生林雄负责，建立了青运工作组，辖暨南大学和中国公学、大夏大学两个小组，由长期从事工运的李楚琛负责建立了工运工作组，辖电车工人和纺织工人两个小组，各小组设立了工人俱乐部，作为经常性的活动据点。

1935 年底，由裘朝慎、张觉初、陈伊林、李宏略、丘锷仑 5 人组成了农工党广

州市委员会，由裘朝慎任书记。1936年春建立了秘密外围组织“青年联络点”。因发动抵制日货的示威游行，遭当局镇压，“青年联络点”被破坏，陈柏麟等7人被捕。华南区的军事工作，从1935年起即已开始，在梅县、汕头、惠州等地区建立了少量的地方武装，在汕头组织了“反日十人团”等。华南区除广州组织外，还联系湖南组织。

1936年夏正式成立了日本东京支部，李述中为主要负责人。1935年至1936年，日本文部省用中国的“庚子赔款”设立针对中国留日学生的助学金，以达到培植亲日学生之目的。李述中、李佑辰等发动“帝国大学同学会”和其他学会的力量，起而反对。经过反复斗争，终于取得胜利。1936年，中国人民的抗日怒潮日益高涨，东京支部党员纷纷回国抗战。启程较晚的，则遭到日本当局的迫害。1937年8月14日，陈炯煊、陈盛智等被捕，一直关押到南京沦陷的前一天才被“驱逐出境”。东京支部

是在中日民族矛盾极为尖锐的形势下，留在敌人心脏进行反日反蒋活动的，并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彰显了农工党人勇敢坚强的战斗精神。

### 推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政策，使要求抗日救国的力量迅速团结起来。为了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早日形成，农工党运用各种渠道积极开展工作。

1936年7月间，国民党召开了五届二中全会，蒋介石迫于全国人民的抗日呼声、以及英、美的压力，会上表现了对日寇态度的某些改变。因此，9月1日，中共中央向中共全党发出了《关于逼蒋抗日的指示》，指出目前中国人民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对蒋的政策应从“抗日反蒋”改为“逼蒋抗日”。1936年10月，黄琪翔接陈诚电召由德国回国，途经香港时与章伯钧、彭泽湘、彭泽民、丘哲、郭冠杰、杨

逸棠、李伯球、陈卓凡等会晤，着重研究了对时局的意见，一致认为：当前的首要问题是如何推动联合，进行抗战。明确了在当时条件下由“反蒋抗日”转变为“逼蒋抗日”的重要意义，并开始贯彻执行。

1936年11月（“西安事变”前一个月），农工党利用与杨虎城的原有关系，派中央委员罗任一为代表，从上海去西安与杨虎城联络，以促进联合抗日的早日实现。罗任一到达西安后，受到杨虎城的热情接待，并介绍罗任一与东北军主帅张学良见面会谈。参加会谈的有张学良、杨虎城、罗任一、孙蔚如、卢广绩5人，会谈的中心内容是如何联合抗日。罗任一在西安期间，还同杨虎城以郊游方式在野外进行交谈，并应杨虎城的邀请，到西安绥署步兵军官学校和17路军的团以上军官大会上作国际形势和团结抗日的讲演。罗任一的西安之行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第二次国共合作逐渐成熟，为团结抗战，周恩来、

朱德、叶剑英等中共领导人到南京和蒋介石谈判。在此期间，周恩来等同黄琪翔经常交往，周恩来希望黄琪翔发挥推动和促进作用。黄琪翔在这些交往中受到很大鼓励，完全同意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团结全国人民，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表示愿为此尽到自己的责任和力量。

1937年春，农工党中央特派员彭泽湘到北平视察党务，进行抗日联合战线活动，联络北平数十位著名教授学者签名发表抗日宣言。6月，毛泽东通过李锡九邀请彭泽湘到延安共叙国是。彭泽湘在延安受到盛情接待，毛泽东连续三四个晚上到陕北饭店同彭泽湘叙谈。毛泽东向彭泽湘询问了广西、上海等地的情况以及两广军政人员对抗日的态度，分析了中国的历史和国家的形势，阐述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等等。6月12日，毛泽东致电中国共产党北方局负责人，告知已与彭泽湘在延安谈好合作问题。同日，毛泽东致电潘汉年说：“彭泽湘来延安谈，尚好，表示

同意我们主张并愿合作。他…约半月到上海，我嘱他找你。”从延安返回时，林伯渠送来毛泽东给北平几位大学教授的信件，请彭泽湘带回北平转交。彭泽湘在延安逗留一周，深感“受益不浅”。他7月5日回到北平后对农工党华北局的干部说，日寇如此欺负我们，抗战不可避免，我们应当做好充分准备。抗战一爆发，只要坚持打下去，中国人民是可以打到底的。



1936年10月，农工党领导人在香港集会，商议响应中国共产党《关于逼蒋抗日的指示》，决定改“反蒋抗日”为“逼蒋抗日”。11月，派中央委员罗任一为代表，到西安与张学良、杨虎城联络，商谈联合抗日。图为会谈期间合影，左起：卢广绩、杨虎城、张学良、罗任一、孙蔚如。



1937年8月，国共两党在南京谈判，21日达成合作抗日协议。图为国共谈判期间，农工党领导人黄琪翔及夫人邀请双方谈判代表到南京黄琪翔寓所餐叙时的合影。左起：张群、叶剑英、郭秀仪、黄琪翔、周恩来、朱德。张群为国民党谈判代表，周恩来、朱德、叶剑英为共产党谈判代表。

## 4、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投身全面抗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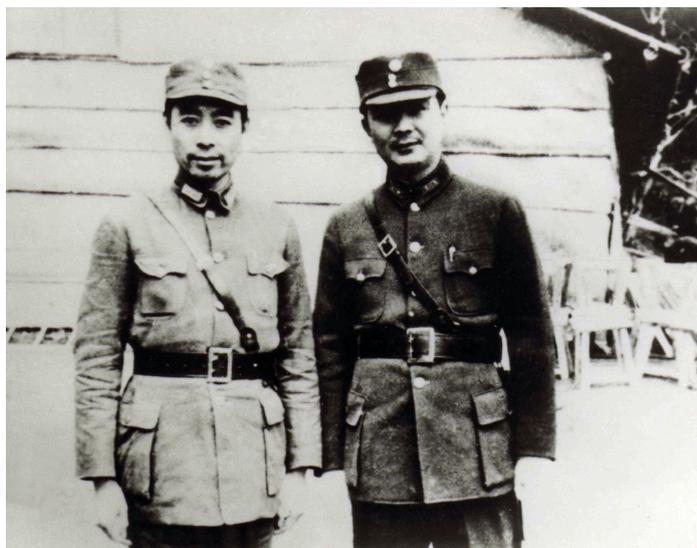
### 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37年7月7日夜，日寇在北平西南的卢沟桥附近突然向中国驻军发起进攻，中国官兵奋起抵抗，日寇全面侵华的“七七事变”爆发。7月10日，农工党领导人彭泽民与章伯钧联名致电蒋介石、国民党中央，提出抗日救国的“八大政治主张”。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日，蒋介石发表承认中国共产党合法地位及两党合作抗日的谈话，并表示对爱国民主党派“无不开诚接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农工党以民族利益为重，采取了同国民党合作的态度，承认“国民政府”为抗战政府，承认蒋介石为抗战“领袖”，通令全党停止

对国民党的斗争，积极参加和开展一切抗日活动，并尽量争取投入到抗日第一线。

1937年12月，黄琪翔从安徽到达武汉后，蒋介石为了分化农工党，指名要求黄琪翔参加国民党。黄琪翔将此事告知章伯钧、彭泽湘和丘哲，章伯钧等一致主张黄琪翔参加进去，为以后党的工作争取一些有利条件。1938年春，华北、华东等地相继失陷，团结抗日的呼声遍及各地，迫使国民党在武汉改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并增设政治部，以陈诚为部长，周恩来、黄琪翔为副部长，丘哲任设计委员。黄琪翔、丘哲与周恩来、叶剑英以及在汉口的民主人士常相来往，商讨扩大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农工党员朱代杰、庄明远、丘学训、陈继中、麦朝枢、何自坚、杨逸棠、黄禾春、黄心维等一批干部，均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任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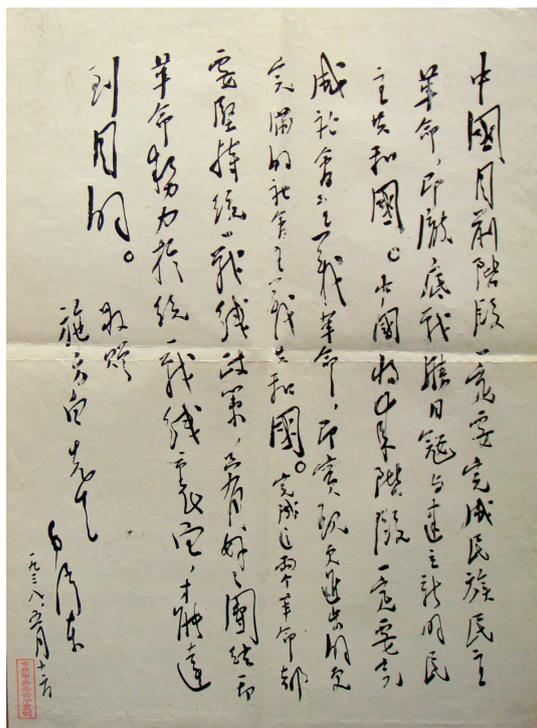
1938年，黄琪翔与周恩来同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时在武汉的合影。

## 贯彻中国共产党“全面抗战”“持久抗战”的路线方针

1938年春，农工党负责人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在武汉举行了“两党会谈”。先是由章伯钧同董必武商讨了有关抗日游击武装的问题，着重谈到了农工党在安徽的游击队与新四军的关系。随后，章伯钧、彭泽湘同周恩来、王明代表两党举行正式会谈。双方共同回顾了两党过去的关系，一致表示今后应密切合作，共同战斗。这次会谈的意义非常深远，使农工党受到了教育和鼓舞，清楚了中国共产党“全面抗战”路线和“持久抗战”方针，深感参加抗战“心中有数了”，进一步巩固了同中国共产党亲密合作的思想政治基础。

1938年3月1日，第三次全国干部会议在汉口璇宫饭店举行，出席会议的有章伯钧、彭泽湘、张云川、何世琨、何仲珉、李士豪、王一帆、李伯球、郭翹然、丘哲、

杨清源、朱代杰、邹静陶、万灿、张耀明、蔡一鸣等 20 余人。会议邀请在武汉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周恩来、叶剑英、秦邦宪出席指导。会议由章伯钧、彭泽湘主持，会期一天。会议贯彻了中国共产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和“持久抗战”方针，通过了农工党在抗战时期的政治纲领，通过了农工党抗战时期人民自卫武装组织条例，推选了中央领导机构。除第二次全国干部会议选出的 19 名临时中央执行委员全部保留外，增选王一帆、何世琨、朱代杰、邹静陶、杨清源、王寄一等 6 人为临时中央执行委员，总共 25 人组成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决定仍以黄琪翔为党的主要负责人，所有负责人均暂时不定职务。在黄琪翔未公开身份以前，党的实际工作由章伯钧、彭泽湘共同主持，并推定章伯钧为总联络人。决定全国地方组织分为后方组织和沦陷区组织两个方面。后方组织应配合全国抗战，积极加强活动。沦陷区组织凡能保留的，应尽力保留下来，坚持工作。



1938年春，江苏启东民主人士、农工党员施方白，在武汉经周恩来、董必武介绍，去陕北寻求抗日救国真理。他到达延安并先后3次受到毛泽东的接见。毛泽东回答了他关于抗战的一些问题，并题字赠送给他。图为1938年5月12日毛泽东为他亲笔题词。



1938年春，郭秀仪（黄琪翔夫人）和宋美龄、邓颖超、李德全、史良等在武汉组织战时妇女救国委员会和儿童保育会，开展妇女抗日救亡工作和儿童保育工作。图为保育会常务理事及部分负责人合影，有宋美龄（中排左四）、李德全（中排左五）、邓颖超（后排右一）、郭秀仪（后排右三）等人。



1938年9月，农工党中央机关从武汉迁到重庆半山新村3号。图为1939年农工党员庄明远（右一）、王深林（右四）、丘学训（右五）等与来访的新四军军长叶挺（右六）在农工党中央机关门前合影。

## 黄琪翔领导抗日部队参加抗战

全面抗战打响后，大批农工党员义无反顾奔赴抗日前线，投身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斗。

抗战期间，黄琪翔先后担任第八集团军副总司令、总司令，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第六战区副司令长官，中国远征军副司令长官等职，率领抗日部队参加了1937年的“八·一三”淞沪抗战、1940年的“枣宜会战”、1944年的“滇西反攻战役”等抗战重大战役，为消灭日寇主力作出了贡献。

“八·一三”淞沪抗战，日寇装备精良，海陆空联合作战，中国军队缺乏现代化武器，全赖血肉之躯与之相抗。但中国官兵同仇敌忾，斗志昂扬，以“一寸山河一寸血”的守土职责，以劣势装备与敌人顽强血战3个月，歼灭日寇7万人，粉碎了日寇速战速决的美梦，也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同情和尊重。其间，

农工党员组织了“抗日后援队”、“前线慰劳队”等，开展募捐支援前线，慰问抗日部队。杨逸棠、李卓贤、裘朝慎等一批农工党员和干部在前线与日寇浴血奋战，党的干部裘朝慎在淞江狙击战中英勇牺牲。

1944年5月，卫立煌、黄琪翔指挥中国远征军强渡怒江，发动了震惊中外的滇西反攻战役。经过长达6个月的顽强战斗，终于在11月上旬，粉碎了日寇的负隅顽抗，歼灭日寇5万多人，为抗日战争史增添了辉煌的一页。滇西反攻战役是中国抗日正面战场上最先开始战略反攻的一次战役，不仅肃清了滇西的日寇，解除了抗日正面战场的背后威胁，而且保障了战略物资运输线的畅通。

### 季方在苏北苏中地区参加领导抗敌斗争

“七七事变”后，季方前往上海参加宋庆龄发起建立的“华东武装抗日自卫委

员会”。季方坚信：抗战必胜，但必须依靠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如依靠蒋介石政府的领导，则抗战必败。

1939年春，季方经香港飞抵重庆，取得“国民政府战地党政委员会少将指导员”的身份。后经辗转，于同年秋回到家乡江苏。1940年夏，陈毅、粟裕领导的新四军北渡长江，在扬州、江都沿江一带打击日寇，开创苏北敌后抗日根据地。但鲁苏战区副总司令兼江苏省政府主席韩德勤积极执行国民党顽固派限制“异党异军”的政策，不断制造反共事端。季方不辞辛劳，为团结抗日奔走于韩德勤和地方实力派处，动员他们同新四军联合抗日。获知韩德勤决意反共，其心腹89军军长李守维召开作战会议准备与新四军决一死战的信息后，季方立即赶往新四军驻地，向陈毅报告情况。陈毅从容应对，几天时间就将李守维部击溃，史称“黄桥战役”，为巩固苏中苏北抗日根据地奠定了基础。

“黄桥战役”后，中共中央部署新四军苏北抗日部队东进至黄海边，陈毅、粟裕决定迅速派出部队继续东进，开辟南通、如皋、海门、启东一带的抗战新局面。但此时这块滨江临海之地，还盘踞着互不隶属的六七支杂牌部队，共3万多人，情况复杂。为扫除新四军东进的障碍，急需协调做好这些部队的工作。季方接受陈毅司令员的郑重邀请，担负起这个光荣使命。季方请新四军派得力政工干部协助，陈毅遂派陈同生以新四军记者的身份协助季方。

1940年11月初，季方以“国民政府战地党政委员会少将指导员”的身份，前往苏中第四区专署所在地如皋县掘港镇，召开国民党系统党政军联席会议，提出：我们同新四军合作抗战，要表里如一，精诚团结，不能暗地里搞鬼。军事上要统一指挥，政治上要统一领导，财政上要统筹统支，不能各自为政。会议决定：成立苏四区（因当时南通为江苏省第四区）游击指

挥部，季方担任总指挥。为了稳定局势，季方以群众团体的名义，电请新四军苏北指挥部接管苏四区。陈毅派陶勇率新四军第三纵队进入苏四区。但反动顽固分子徐承德带领的游击第六纵队不服从领导，乘季方、陶勇外出开会、新四军第三纵队主力西调之机，突然围攻设在掘港镇的苏四区游击指挥部，季方、陶勇闻讯赶回，调新四军第三纵队主力将徐承德部击溃。

掘港保卫战后，1941年3月正式成立新四军苏中第四军分区司令部，季方任司令员。从此，南通、如皋、海门、启东地区，建立起了巩固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实现了新四军苏北抗日部队东进至黄海边的战略目标。

新四军领导人陈丕显高度评价季方的工作，他说：“当时在南通，季方是最有威望的。这个人的德行很好，赞成我们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他以国民党战地党政委员会指导员的名义到南通来，召集苏四区党政军联席会议，成立了苏四区游击指挥

部，他任总指挥…… 。没有季方，就得靠打，才能统一南通、如皋、海门、启东。有了他，那些杂牌部队收编过来了。”



1940年，新四军苏中第四军分区司令员季方（右三），与陈丕显（右一）、钟期光（右二）、管文蔚（右五）等在苏中抗日根据地合影。

## 朱程在冀鲁豫边区参加领导抗敌斗争

1934年春夏，朱程东渡日本留学，次年在东京参加农工党。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之际，他毅然中断学业，于1937年5月回国抗日。

朱程回到祖国后，经介绍到河北磁县的“河北民军总指挥部”担负训练工作，先后担任河北民军第10大队、第11大队大队长，第11团、第4团团长。在任河北民军第11团团团长时，朱程支持该团政治部主任闻允志（中国共产党地下党员）建立中国共产党秘密支部，发展中国共产党党员。该团的政工干部多数是中国共产党党员，11团实际上已成为中国共产党掌握的抗日武装。朱程率部队在山西陵川县活动，配合八路军独立游击支队作战，并为之建立联合民运工作团，动员群众参军参战，训练抗日自卫队等。

河北民军总指挥张荫梧对朱程所率的第11团与八路军游击支队的合作极为恼

怒，彻底撕破其抗日伪装，变本加厉地搞反共摩擦，杀害中国共产党党员和抗日干部，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同时，将朱程的第11团与第4团合并，欲剥夺朱程的指挥权。经过机智激烈的斗争，朱程控制了第4团的指挥权，保住了这支抗日队伍。张荫梧又指派反共老手高自登剿灭朱程所部。1939年7月7日，朱程所率的第4团召开“七七”抗战两周年纪念大会。会上，朱程揭露了张荫梧的反动罪恶，代表全团发表了脱离河北民军宣言，并通电全国。朱程的正义行动，受到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的欢迎。1939年7月26日，朱德、彭德怀亲笔致信朱程，鼓励他加强部队的军事政治教育。随后，八路军总部派朱光代表朱总司令、彭副总司令和中国共产党北方局，到朱程部队的驻地慰问河北民军第四团的官兵，宣布从7月1日起，河北民军第四团所需的被服、粮食、菜金、生活补贴等，全部由八路军总部供给。1939年8月，经八路军总部批准，以河北民军

第四团为基础，建立“华北抗日民军”，朱程任司令员，由八路军前方指挥部直接领导。1940年初，“华北抗日民军”正式编入八路军第二纵队，番号为华北抗日民军第一旅，朱程任旅长兼冀鲁豫军区第五军分区司令员。

此后，朱程所部在八路军前方指挥部的直接领导下，坚持敌后游击战争，深入敌占区打击敌人，拔除日寇据点，消灭伪军、国民党顽军，肃清土匪等，为豫北开辟太行南区抗日根据地和巩固冀鲁豫边区（沙区）抗日根据地，作出重要贡献。1943年9月，朱程在山东曹县反“扫荡”战斗中壮烈殉国，为民族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生命。

冀鲁豫军区杨得志司令员称赞朱程率领的“华北抗日民军”为“铁军”。他说：“华北抗日民军到达沙区后，在与当地群众密切携手下，英勇作战，成为开辟与坚持沙区根据地的一支强大力量。”



## 组织游击武装开展抗日斗争

农工党第三次全国干部会议后，农工党中央向有条件的省区派出得力干部，先后在北平、天津、河北、浙江、江西、广东、安徽、福建、河南等地，建立游击武装，开展抗日斗争。

“七七事变”后，农工党北平组织由王守先等负责。王守先与“中华民族抗日解放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王守先已加入）成员支道三在河北涿县组建抗日游击队，对日寇进行骚扰。不久，游击队被打散，支道三殉难。王守先也于1937年10月被日本宪兵逮捕，遭受酷刑折磨，凶残的鬼子用钳子拔掉他的10个指甲，但他坚贞不屈，最后日寇放出狼狗将他活活咬死。

北平沦陷前夕，何世琨、王一帆、杨超人、蒋春信、王导、禹金菱、覃汉川等，按计划离开北平到达河南新乡，以新乡铁

工厂的一批党员为基础，筹建抗日游击队。经王一帆争取，从第二战区司令部得到“豫北游击第二纵队”的番号，人枪 1000 余，由李旭东任司令，在豫北和漳河两岸的林县、临漳、大名、成安一带进行游击活动，骚扰打击敌人。

1938 年 10 月，广州沦陷后，彭泽民领导成立了“大鹏人民自卫总队”，在广九铁路东、大鹏湾、大亚湾一带打击日寇，配合中国共产党开展敌后抗日斗争。叶荃、张平在太平湾建立了一支自卫武装，配合中国共产党东江纵队开展抗日斗争。1938 年冬，司徒卫中建立了“民众抗日游击支队”，自任司令，在粤北的新丰、佛岗、英德等地，以及广州地区的番禺、增城、龙门、从化一带，开展抗日游击战，经过大小战役 10 余次，击毙日寇、伪军百余人，缴获大量军用物资。在残酷的对敌斗争中，李义容、季辉、何苟、王记仔、李文初、陈锦、陈培等 80 多人英勇牺牲。

## 5、在抗日烽火中同中国共产党结成了患难与共、风雨同舟的亲密关系

### 坚决反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分裂行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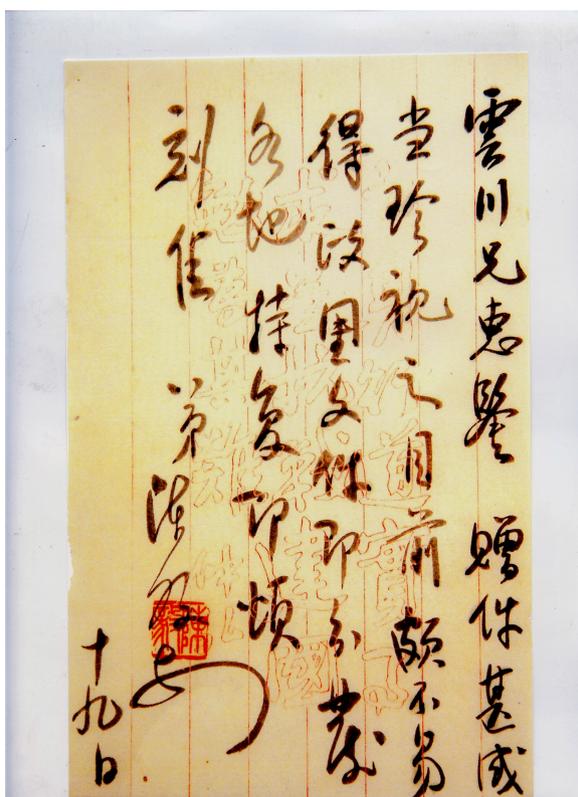
“武汉会战”粉碎了日寇“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美梦，日寇在财力、物力、兵力方面左支右绌，难以立即再次发动大规模的战役。正如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所预见的，抗战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日寇对侵华方针作了调整，采取“政治上诱降国民党政府、军事上打击八路军和新四军”的策略，逐渐将主力用来对付中国共产党及抗日根据地。

1938年11月，日本政府发表声明，公开向国民党政府进行诱降。此后，国民党当局采取了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反人民的政策，先后在华北、华南和陕甘宁边区发

动了三次反共高潮。对国民党顽固派反共、反人民的分裂投降行径，中国共产党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方针策略，有效克服了几次濒于全面分裂的危机，也为农工党指明了斗争的方向。农工党在政治上由抗战初期的“联共拥蒋”复而转向“联共反蒋”。在反对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皖南事变”的斗争中，农工党坚定地站在中国共产党一边。

为揭露国民党顽固派对解放区的诬蔑，在周恩来和董必武的支持下，张云川代表农工党和民盟，于1943年春从重庆出发前往苏北解放区考察访问。几个月的考察，使张云川“进一步清晰地认识到人民是抗日战争力量的源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是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的希望，解放区是实行民主政治的榜样”。张云川也被陈毅称为“中国共产党的诤友”。返回重庆后，张云川向中国共产党南方局领导人董必武作了汇报，并接受塔斯社和路透社记者的采访，向中外记者介绍了解放区的

真实情况。同时以“刚文”为笔名，在新华社的《群众》双周刊上发表《苏北见闻》。随后，张云川又专程到昆明、桂林等地，沿途宣传新四军解放区的情况，历时两月余。为此，罗炳辉、谭震林于6月18日给张云川的信中写道：“贵同盟贵党诸君子，关怀敝党之一切政策实施，敝军之艰难作战，高谊隆情，使人感佩。尤以吾兄不辞山川跋涉之苦，代表贵同盟贵党亲临指教，惠我多多，弟等代表敝师全体同志，谨向兄致最敬之谢意。”并勉励说：“尚乞传语贵同盟贵党诸君子，为国珍重，为民主政治之贯彻贯彻到底。”



1943年夏，张云川到达苏北解放区，受到新四军代理军长陈毅及其他新四军领导人的热情接待。图为张云川离开军部后，陈毅写给张云川的信。

## 坚决抵制国民党顽固派的拉拢与压迫

早在 1938 年 7 月，蒋介石就要陈诚通过黄琪翔的介绍，两次找章伯钧和彭泽湘，要求取消农工党，合组三民主义青年团，均被章伯钧等严词拒绝。后来蒋介石又叫陈公博找到彭泽湘，要彭泽湘提出取消组织的条件，彭泽湘也坚决拒绝。陈立夫三次拜访章伯钧，要他参加政府担任部长，并称无论哪个部的部长都可任由选择，但条件是解散农工党。章伯钧表示要他单独参加政府不行，要中国共产党参加政府，才算真正的联合政府。“皖南事变”后的 1941 年 3 月，第二届国民参政会召开，国民党当局取消了章伯钧的国民参政员资格。

蒋介石还托黄琪翔向农工党转达他的意见：农工党是继承邓演达遗志的，现在全国抗战是进行民族主义革命，也是邓演达主张的一部分，农工党自应列入全国一致的抗战行列，在艰苦抗战中，也应由政

府分配一些实际工作，打算由政府拨出一笔款子，指定一定地区，由农工党主持进行实验工作，安定秩序，组织生产，以厚国力，继续抗战。黄琪翔将蒋介石的意见告诉了章伯钧、庄明远、杨逸棠、丘学训、黎纪纯等人，大家听后极为愤慨，一致认为：当前的抗战，我们实际上已经参加了，各有各的工作岗位和应尽的职责，我们继承邓演达的遗志，有具体的主张，有一致的行动，我们始终是在颠沛流离中坚持不渝地奋斗着，现在只希望政府有开明的政治表现，在团结抗战的大前提下和全国人民一道共同奋斗，以达到抗战胜利的目的，至于由政府分配实际工作，拨款划地进行实验，实非必要。坚决抵制了蒋介石的威胁利诱。

### **坚持偏向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立场，开展整党，巩固组织**

抗战进入艰苦的相持阶段，国内政治斗争日益复杂化，一部分党员对革命前途、

党的前途丧失信心而脱离了党的队伍。农工党个别领导人慑于国民党的压力，提出“在国共两党之间采取超然态度，持绝对中立”的主张，幻想在国共两党的斗争中采取不偏不倚的中间立场，走中间路线。但章伯钧等绝大多数农工党领导人坚决反对，认为国共两党的矛盾和斗争，实际上是“团结、抗战、进步”还是“分裂、妥协、退步”的选择，“超然的中立”是难以存在的，政治上没有什么绝对的中立，总是要偏向某一方面的。“我们是代表农工平民的政党，应当偏向共产党。”这种政治原则上的分歧日益尖锐。

为了统一党的思想，纯洁党的组织，提高党的战斗力，争取实现民主抗战的主张，农工党中央于1940年10月10日向全党发出《整党通知》，并派出中央工作团到各地负责贯彻检查整党情况。在《整党通知》中，强调了开展这次整党工作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本党为代表工农平民谋解放之革命政党，当前任务在求民主政治之

实现，民族独立、自由和强盛，而最终目的则在于社会主义社会之建设。故关于组织工作之改进，必一扫过去萎靡散漫之积习，力求阵容之严整，纪律之奉守及一般党员生活之规律化。具体规定了“重质不重量之原则”，要求全体党员重新登记和宣誓，提出党员工作标准和《八条戒律》，作为全党同志新的行动准则，提出有关吸收新党员的要求。经过这次整党，清除了党内的意志消沉分子，吸收了一批骨干参加组织，如王深林、郭则沉、严信民、韩兆鹗、杨子恒等。农工党“吐故纳新”，增强了战斗力，增进了团结。

### 倡议并参加组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

1939年初，以国民党召开的五届五中全会为标志，蒋介石集团破坏抗战镇压人民的活动日益加紧。为推动民主运动的发展，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1939年10月，章伯钧、梁漱溟、黄炎培、张澜、沈钧儒、

罗隆基等发起组织了“统一建国同志会”，订有信约十二条，旨在集合各方热心国事之上层人士，推动民主宪政运动的发展。“皖南事变”后，“统一建国同志会”的各党派人士认为：非民主团结，大局无出路；非加强中间派的组织，无由争取民主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章伯钧、丘哲等倡议组织第三者的政治同盟，一则抗拒蒋介石的打击，一则同中国共产党合作。1941年3月19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简称民盟）在重庆上清寺特园秘密举行成立大会，通过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政纲》、《敬告政府及国人》和《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简章》，选举黄炎培、章伯钧、左舜生、张君勱、梁漱溟5人为常务委员。推黄炎培为常务委员会主席，左舜生为总书记，章伯钧为组织部长，罗隆基为宣传部长。

民盟的成立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大力支持。1941年10月28日《解放日报》发表题为“民主运动的生力军”的社论，对民盟的建立及其纲领给予了很高评价。

在民盟“三党三派”（三党是农工党、青年党、国家社会党，三派是中华职业教育社、乡村建设协会和救国会）中，农工党是历史较长的政党之一，在邓演达的旗帜下经过百折不挠的奋斗，有一定的组织基础和干部班底。以农工党成员为主力，先后建立了民盟桂林核心小组、东南总支部、南方总支部、华北地下组织、西北总支部筹委会、湖北支部、贵阳支部、上海支部、南京支部、广东支部、港九支部、成都支部，对民盟的组织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民盟成立后，农工党的工作重点置于民盟，党员一般都加入民盟，以民盟名义开展活动。这种情况，直到抗战胜利后才开始逐渐改变。农工党在章伯钧等领导人的带领下，积极争取共产党的帮助，联合救国会和广大进步的盟员，推动民盟的工作发展，为实现民盟的政治主张而斗争，坚持了比较正确的立场，发挥了支柱作用。民盟始终保持同中国共产党亲密合作，为

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为抗战胜利后争取和平民主、反对独裁内战，为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和建立新中国都做出了重要贡献。



1941年3月，农工党以章伯钧、丘哲为代表，参与筹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图为民主政团同盟负责人在重庆上清寺合影。右起：章伯钧、史良、左舜生、张澜、沈钧儒、罗隆基。

## 在重庆同中国共产党举行“两党会谈”

抗日战争时期，特别是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进步、中间、顽固三种力量之间的斗争，一般是围绕着抗战与民主两个问题展开的。这实质上是用什么路线争取抗战胜利和建立什么样的国家的斗争。在这场大是大非的斗争中，农工党坚定地同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边，不断抨击国民党顽固派的谬论，与中国共产党紧密配合，通过发表宣言、讨论发言等形式，严正地表明自己的态度。

1941年初，农工党中央以章伯钧、丘哲为代表，在重庆曾家岩50号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举行正式会谈。会谈中，章伯钧表示了进一步加强同中国共产党合作的诚意，希望中国共产党在政治、经济、组织等方面予以切实的援助。周恩来等极为赞同，并愿给予种种支援。会谈后，周恩来等向中共中央报告：农工党近因当局之压迫，日渐左倾，

现正整顿其组织，并提出联俄联共之中心主张，与我们建立密切之合作。该党凡在大是大非的斗争中，都站在共产党一边，采取了积极的态度。中共中央在1941年3月22日编报的《政治情报》中也说：农工党与我们最接近，是最同情我们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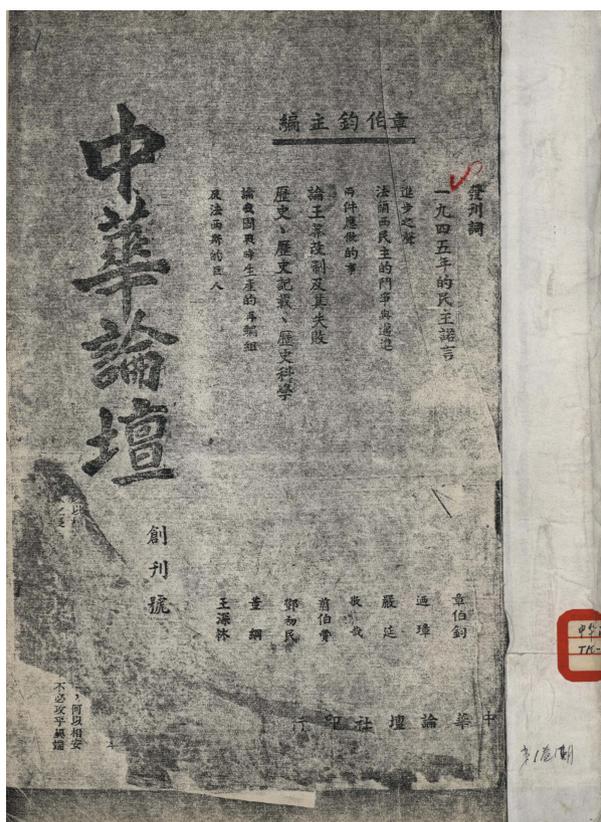
### 创办《中华论坛》，支持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

1945年初，国内外形势表明抗日战争已接近最后胜利，如何“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问题，已经摆在了中国人民面前。1945年1月，中国共产党提出“立即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一个由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和无党派人士的代表联合组成的临时中央政府”，并提出立即着手召开各党派和无党派代表人士的圆桌会议。

国民党顽固派坚持召开其一党独裁的“国民大会”，以对抗中国共产党提出的

“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在这场激烈的斗争中，农工党完全支持中国共产党的提议。为配合斗争，农工党于1945年2月创办机关刊物《中华论坛》半月刊，旨在“站在人民的立场，为民族民主革命的双重任务的彻底完成，为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的伟大前途，努力尽责”。

《中华论坛》创刊后，章伯钧在《中华论坛》连续撰文，郭沫若、邓初民、胡绳等知名人士踊跃发表政论文章，旗帜鲜明地揭露、抨击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和反共行径，呼吁召开紧急时局会议，建立民主统一政府，实行宪政。



1945年2月1日在重庆出版的农工党中央机关刊物《中华论坛》半月刊的创刊号。

## 章伯钧等六位国民参政员访问延安

为了调停国共关系，听取中国共产党的意见，促成党派会议的召开与联合政府的成立，1945年7月1日，农工党领导人章伯钧与褚辅成、黄炎培、冷遹、傅斯年、左舜生六位国民参政员，由王若飞陪同从重庆飞抵延安，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林伯渠、张闻天、吴玉章、邓颖超、叶剑英、李富春、杨尚昆等到机场迎接并合影。2日下午，六位参政员与中共中央代表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林伯渠、张闻天、王若飞正式会谈，气氛坦率诚恳，十分融洽。当日会谈后，中共中央设宴欢迎，宴后举行盛大的欢迎晚会。3日、4日下午，又举行了两次会谈，主要讨论了关于国民大会和政治会议问题，一致主张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联合政府等。会谈结束后，由中国共产党方面整理出《会谈纪要》，郑重委托六位参政员转交国民党当局。

毛泽东单独约见了章伯钧，希望今后加强中国共产党与民盟以及中国共产党与农工党之间的密切合作。章伯钧完全赞同，并诚恳地表示要全力地无保留地支持中国共产党的主张。

在延安期间，章伯钧对负责接待参政员的延安交际处的金城说：“我过去也参加过共产党，后来脱离了，但是我没有忘记同党的关系。现在我虽然还不准备要求恢复党组织关系，但我要为党尽力的心愿从未改变。抗战开始，我在重庆就向周恩来先生正式表示，如果贵党对国事有何主张，需要各党派表态支持，则不必事先征求我的意见，尽管将我的名字签上。”

六位参政员回到重庆后，集体面见蒋介石，陈述了他们同中国共产党会谈的情况，并将《会议纪要》交给蒋介石，随后积极推动国共双方恢复和谈。但蒋介石未作任何回应。

章伯钧在农工党中央机关（重庆半山新村3号）向农工党干部介绍了延安之行。

他说：我们在延安参观了机关、部队、学校和街道，印象深刻。延安的生活是比较艰苦的，但是人们的精神面貌是愉快而振作的。不管干部、战士和群众都是精神抖擞、朝气蓬勃，团结一致，艰苦奋斗，积极工作，不畏困难，一片兴旺的抗战景象，使人深受感动和鼓舞！但是我们看看国统区：政治腐败，贪污成风，享乐腐化，上下争利，压迫剥削，民不聊生，这种情形，谁不痛恨！最后，章伯钧肯定地说：国民党政府腐败已极，已失掉民心，是没有办法的了，在中国只有共产党才是我们的希望！



1945年7月1日，农工党领导人章伯钧等六位国民参政员为商谈国共两党团结，共建国内和平问题飞抵延安。毛泽东主席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到机场欢迎。图为（自右至左）毛泽东、黄炎培、褚辅成、章伯钧、冷遹、傅斯年、左舜生、朱德、周恩来、王若飞在延安机场合影。

**周恩来：邓择生先生和我们是老朋友，今后我们要继续同你们做朋友。**

在重庆，中国共产党南方局领导人周恩来等是张申府、章伯钧家中的常客。农工党认定“中国共产党是抗战与民主中的最可靠的朋友”，因而始终坚持在政治上同中国共产党保持一致，斗争中同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边的政治立场。到抗战后期，农工党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已经非常密切，不仅仅是互通情况，而是每一件重大事项都主动向中国共产党通报，请中国共产党同志给予指导帮助。

1939年3月9日，周恩来、邓颖超宴请农工党中央委员连瑞琦和夫人胡佩芬、中央委员唐午园和夫人李冬青，商议对国民党四川高级军政人员潘文华做工作的问题。

1939年6月，农工党员任谦策动甘肃农民暴动，这是周恩来、章伯钧等在农工

党员王人旋家里开会商定的，并由连瑞琦陪同任谦乘汽车到各处秘密接洽。

1942年2月，周恩来、章伯钧、罗隆基与刘文辉进行秘密会商，讨论团结西南实力派，联合抗日的问题。5月6日，周恩来致电中共中央，报告他曾通过杨杰和章伯钧的介绍，与左舜生、罗隆基同西南地方势力刘文辉、潘文华面谈两次。

1943年9月17日，周恩来致电董必武，提议通过章伯钧联络龙云，在龙云的行营中建立电台。

1944年，在日寇势成弩末，汉奸伪军开始徘徊动摇之际，张云川与章伯钧商定，经周恩来同意，赴华东、华北从事敌伪策反工作。1945年，张云川到北平经王大鲁介绍，与伪燕京道公署道尹马志滨见面，对马志滨进行策反。经过谈判，马志滨同意了张云川的要求，在抗战接近最后胜利时，命令伪燕京道所辖北平周围11个县的地方武装全部向人民军队投降，并配合人民军队向日寇进行反攻。

1945年1月，周恩来在重庆曾家岩50号宴请章伯钧、郭则沉、韩兆鹗、刘宗宽等农工党领导人和干部。据参加宴请的刘宗宽回忆，宴请时，周恩来分析了抗战胜利在望的形势，要求大家走团结和民主的道路，共同打败日本侵略者。周恩来还提到了中国共产党过去犯的关门主义错误：由于过去认为反对国民党的中间派是“最危险的敌人”，因此拒绝与之联合，认为比国民党还要坏，这就把一切愿意革命和可以争取的朋友一概拒之门外，孤立了自己，帮助了敌人。在“福建事变”时，如果我们当时善于联合这些主张反蒋抗日的力量，共同对付蒋介石反动派，这对支持和发展国内日益高涨的抗日民主运动会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并且可迫使蒋介石首尾不能照顾，趁此机会就可以消灭一部分敌人，粉碎敌人对中央苏区的“围剿”。可是由于左倾主义断言中间派是中国革命所谓“最危险的敌人”，竟然坐失良机，使敌人从容调兵东下，摧毁了福建人民政府，又

掉转头来全力对我中央苏区大举围剿，使革命遭到很大损失。这是一个惨痛的教训。

周恩来表示：抗战已经七年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已取得决定意义的胜利，当前要加强团结，积极开展抗日民主革命的统一战线工作，配合同盟国，迎接新形势的到来。

周恩来强调：邓择生（注：邓演达）先生和我们是老朋友，今后我们要继续同你们做朋友，加强联系，密切合作，有事多商量。

周恩来的话是对农工党抗日反蒋革命活动的充分肯定。



## **四、为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和 建立新中国而奋斗**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面临两种命运、两个前途大决战的历史转折。为建设一个和平民主的新中国而斗争，成为农工党的新目标。在解放战争时期，农工党为争取和平民主、实现和平建国，为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独裁统治、建立新中国做出了贡献。

### **1、拥护国共和谈，支持中国共产党的 立场和主张**

抗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同国民党在

重庆进行和平谈判。农工党拥护国共和平谈判，支持中国共产党的和谈立场和主张，致力民主和平，坚决反对内战、反对独裁。

农工党领导人黄琪翔，以现役高级军官的身份，第一个站出来公开声明：“从此退役，绝不参加内战。”

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曾三顾特园（民盟中央机关）走访民盟领导人（章伯钧既是农工党领导人，也是民盟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等与民盟和各界人士进行了广泛接触，交换意见，增进了解。农工党领导人章伯钧 1945 年 9 月 14 日对《新华日报》记者发表关于时局的谈话，支持中国共产党的一贯立场和主张，要求国民党应立即结束党治，实现民主，给人民以民主权利，并承认现有一切抗日民主党派合法地位。

经过 43 天复杂而艰苦的谈判，1945 年 10 月 10 日，国共两党签署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议纪要》（即《双十协定》）。国共重庆谈判取得了重要成果，主要是国民党政

府接受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和平建国基本方针；双方协议“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基础”，“长期合作，坚决避免内战，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双方还确定召开各党派代表及无党派人士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共商和平建国大计等等。延安的《解放日报》评论说：会谈不仅在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上有了令人满意的明确解决，而且对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党派平等合法，也有了初步的协议，给今后的圆满解决，开辟了成功的途径。

## **2、围绕政协协议同国民党一党独裁作斗争**

### **为通过政协协议发挥积极作用**

蒋介石反动集团坚持独裁内战的方针是既定的，但在当时的国内外形势下，为

了争取更多的时间调动内战资源，不得不同意召开政治协商会议。

1946年1月10日，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农工党领导人章伯钧是民盟参加政协会议的代表之一。在会议召开之前，民盟代表同中国共产党代表约定：双方携手合作，互相支持。在会议进行期间，中国共产党代表经常同民盟代表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在会下进行磋商，并在一系列问题上采取联合行动。

政协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关于政治民主化和军队国家化的问题。在政治民主化方面，首要的问题是改组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府。在军队问题上，国民党主张必须先军队国家化才能政治民主化，即必须由共产党首先交出军队，然后才能开放民主。中国共产党方面则认为，离开政治民主化来谈军队国家化，只能是军队的军阀化、党阀化。针对政协会议争论的焦点问题，部分人士对蒋介石集团的阴谋认识不清，有的要求中国共产党放下武器。在这种情

况下，农工党领导人章伯钧指出：没有真正的政治民主化，绝难达到军队国家化的目的。国民党不取消一党专政，中央军还是中央军，仅片面要求共产党放下武器，国家化就是缴械给国民党。不仅共产党无法也不应放下武器，就是一切要求民主的党派和全国人民，也都不会同意共产党放下武器。章伯钧在发言中告诫国民党：莫要崇拜单纯的武力，轻视人民，对于国共之争，切莫在军事上打主意，最安全的道路，是走政治的途径。

政治协商会议历时 22 天，于 1946 年 1 月 31 日闭幕。会上经过激烈斗争，最终通过了政府组织案、国民大会案、和平建国纲领、军事问题案、宪法草案等五项协议。

政协协议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个人独裁的政治制度和反人民的内战政策，具有明显的限制作用，有利于和平建国，基本上符合全国人民的和平民主愿望，因而受到全国人民的欢迎。但国民党顽固分子却说：政协协议是国民党的失败。蒋介石

也对政协协议表示不满。在政协会议期间，国民党暴徒就制造了“沧白堂”事件。1946年2月10日，各界在陪都较场口举行庆祝政协会议成功大会，国民党特务再次蓄意破坏，打伤民主人士多人，制造了震惊全国的“较场口血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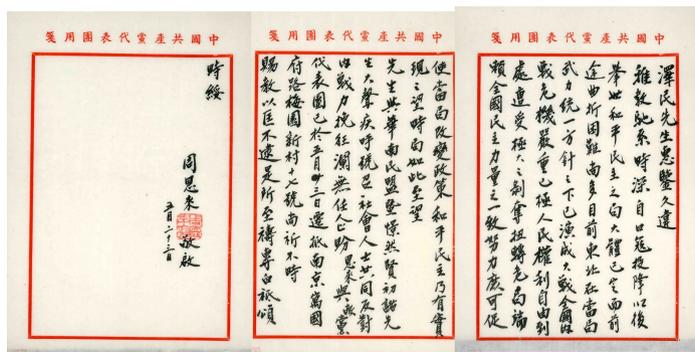
### 为维护政协协议创办《人民报》

政协会议刚刚闭幕，国民党顽固派即进行破坏。特别是在1946年3月初国民党的六届二中全会上，顽固派大叫“执行政协协议就是国民党自杀”，气焰极为嚣张。因此维护政协五项协议，实行民主政治，成为当时斗争的中心。农工党为此于1946年3月1日在香港创办了《人民报》，旨在站在中国农工平民之立场，为彻底完成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为实现民主政治及争取社会主义前途而奋斗，因而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鼓励和支持。创刊之后，周恩来的贺词是“人民之友”，董必武的贺词是“人

民之声”。《人民报》出版后，围绕维护政协协议、争取和平民主、反对内战独裁等，开展了旗帜鲜明的斗争，在华南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发挥了较好的作用。



1946年3月1日，农工党在香港创办《人民报》，后于4月1日迁广州出版。图为在广州出版的《人民报》。



1946年，为促进国共和谈，中国共产党代表团于5月23日由周恩来率领从重庆抵达南京。图为周恩来当日写给彭泽民（农工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书记）的信。信中希望彭泽民“与华南民盟暨憬然、贤初诸先生大声疾呼，号召社会人士共同反对内战，力挽狂澜”。

## 反对并拒绝参加国民党一党独裁的国民大会

按照政协协议，首先改组政府，废除国民党的一党专政，然后由各党派的联合政府主持召开国民大会。但蒋介石却于1946年7月3日擅自决定在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农工党与中国共产党采取一致行动，一是坚决反对，二是拒绝参加。农工党为此发表《对召开国大的意见》，反对国民党包办的国民大会。民盟中央常委会还作出决议，把参加国民大会的“民主社会党”党员清退出民盟。

# 國方堅持各黨派先交國大名單

## 第三方面調解已告失敗

### 章伯鈞氏表示：依據政協原則辦事，為解決國是的唯一途徑。

▲本報上海二日專電 第三方面的調解，因政府堅持各黨派先交國大名單，才頓停戰，而告失敗。章氏昨日下午由京返滬，梁漱溟也定今飛平。據章氏說：這第三方面據選進京，進行調解工作，雖已失但尚未退出調解地位。現已組織各院政協綜合小組，由國共雙方直接交談。並稱：此項建議，正待政府覆。記者問：政府如堅持一黨國大，按期開會，並要各黨派提出名單，第三方面是否參加？章氏答：我認爲民盟人士不致有人參加。章氏最後說：依據政協原則辦事，爲解決國是的唯一途徑。

▲南京二日電 民盟代表張君勱，今日下午三時乘往調解主席。先是今日上午十時半，第三方面代表通議行會議，商討對當前時局意見。（中央社）

▲南京一日訊 美國大使司徒雷登原定今晨飛往北平，但卒臨時取消，聞留在南京，便與各方面保持

▲芝加哥一日電 張翠今晚抵此，他將在此逗留一日，然後前往太平洋海岸取道返國。（中央社）

鄂成向泉大建公報

及如(華)委(奧)  
(江)實(橋)兩路

图为章伯鈞在报纸上发表的谈话，他表示，如果国民党政府坚持一党国大，“民盟人士不致有人参加”，“依据政協原則辦事，为解決國是的唯一途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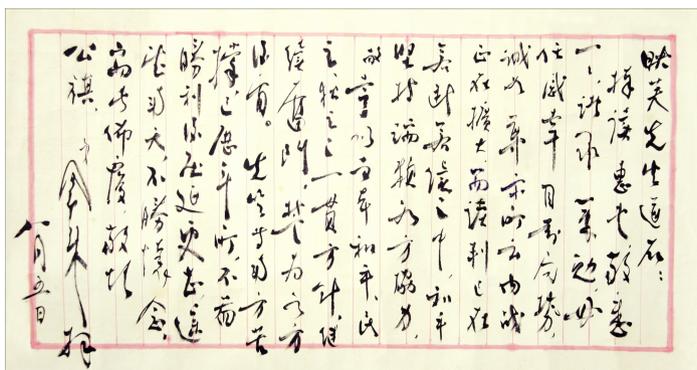
### 3、投身国统区的爱国民主运动

#### 国民党撕毁政协协议和停战协定，内战全面爆发

国民党在完成内战准备后，蒋介石公然撕毁政协协议和停战协定，大举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扬言要在三五个月内消灭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1946年6月26日，国民党军队22万人进攻中原解放区，全面内战爆发。

面对新的形势，中国共产党作出了以人民解放战争“打倒蒋介石”的决策。1946年11月18日，在中共中央致电各中央局、中央分局的电报中，中国共产党开始用“人民解放战争”取代以前使用的“自卫战争”。11月21日，中共中央召开会议，作出重大决策，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以“打倒蒋介石”来最终解决国内问题。由“自卫战争”到“解放战争”，由“制止内战，恢

复国内和平”到“打倒蒋介石”，这是中国革命发展进程中，中国共产党战略指导思想的一个根本性的转变。为了推进革命形势，使之迅速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一个新的高潮，中共中央于1947年2月1日在延安召开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就迎接中国革命高潮问题作了重要讲话。



1946年夏，国民党撕毁政协协议和停战协定，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同时对民主人士进行迫害，李公朴、闻一多等被特务暗杀。时局动乱，许多知识分子纷纷奔赴香港，思想情况比较复杂。丘哲将此状况及自己对时局的看法写信请教周恩来。8月5日，周恩来给丘哲复信，对当时在香港坚持和平民主斗争的丘哲和其他民主人士给予极大鼓舞。图为周恩来给丘哲的复信。



1946年11月17日，参加国共谈判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撤回延安前与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在南京梅园新村留影。左起：周恩来、邓颖超、罗隆基、李维汉、张申府、章伯钧、沈钧儒、董必武、黄炎培、张君勱、王炳南。

## 第四次全国干部会议

抗战胜利后，农工党从 1945 年秋开始，一方面在民盟发挥作用，一方面进行了组织恢复工作。1946 年春，农工党中央机关由重庆陆续迁回上海，在上海愚园路联安坊 11 号设立中央机关。各地方组织经过整顿恢复，部分建立了新领导机构。面对国共和谈破裂，和平民主建国无望，中国共产党作出了“打倒蒋介石”的决策，农工党预感到中国革命的新高潮即将到来，决定在 1947 年初召开第四次全国干部会议，制定新的行动方针。

会前在上海举行了为期 10 天的预备会议。预备会上，对党的名称、党章、党纲及党的行动方针等重大问题争论激烈。有极少数人对美蒋还抱有幻想，提出走“中间路线”。经过激烈的争论和批评与自我批评，最后统一了认识：没有“中间路线”可走，只有跟着中国共产党才有革命的前途。

1947年2月3日，第四次全国干部会议在上海愚园路联安坊11号举行。出席会议的有章伯钧、丘哲、李士豪、李伯球、张云川、王深林、郭则沉、王一帆、韩兆鹗、罗任一、杨清源等40余人。章伯钧作《党务报告》。会议决定将党名改为“中国农工民主党”。会议通过了《中国农工民主党党章》、《关于党的纲领、路线和基本方针的决议》以及《第四次全国干部会议宣言》。会议选举了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当选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25人：章伯钧、丘哲、郭冠杰、张云川、李伯球、王一帆、王深林、李士豪、罗任一、杨清源、杨逸棠、郭则沉、庄明远、季方、严信民、何世琨、曾伟、杨子恒、连瑞琦、郭翹然、云应霖、黄农、黄琪翔、黄朋豪、汤仁溥。当选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9人：丘辰、黄桐华、何仲昆、李健生(女)、徐哲、张耀明、张觉初、任谦、安问石。当选的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0人：彭泽民、韩兆鹗、陈卓凡、唐午园、

王寄一、欧阳平、杨建平、王人旋、李如苍、陈其瑗。当选的中央监察委员会候补委员 5 人：黄慎之、叶粤秀、朱镜堂、祝世康、刘之谋。

1947 年 2 月 15 日，举行第一次中央执行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联席会议，进行了组织分工。推选章伯钧、丘哲、罗任一、李伯球、王一帆、张云川、王深林、郭则沉、李士豪等 9 人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章伯钧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彭泽民为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丘哲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秘书长，王深林为组织部长，李伯球为宣传部长。

四干会议是农工党历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是一次“改造党、健全党、扩大党”的会议。会议总结、肯定和高度评价了农工党的历史，强调党的政治路线自第二次全国干部会议以来同中国共产党密切合作是正确的。会议决定扩大农工党的组织基础，同时加强与中国共产党、民主同盟、国民党民主派以及其他民主党派的联合与

合作，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会议再次明确提出以社会主义为农工党的奋斗目标，继续紧跟中国共产党，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

根据大会确定的“整顿原有组织，进行党员登记，加速发展组织，建立组织机构”的组织工作方针，农工党中央决定设立四个中央分局，分别领导相应区域内的农工党组织：华东局——包括上海、南京、浙江、江苏、福建、台湾、安徽、山东等地；华南局——包括广东、广西以及香港和国外的越南、印尼等地；华中局——包括江西、湖南、湖北等地；华西局——包括四川、云南、贵州、陕西、甘肃等地。四干会议后，农工党在上海、南京、北平、汉口、江西、广东、福建、浙江、安徽、江苏、四川、重庆、广西、湖南、山东、台湾、港九等地，包括一些县城，整顿和建立了地方组织。在云南、贵州和西北地区也建立了联系。

## 本黨第四次全國幹部會議宣言

此後出東以來，國人渴望和平而平並未實現，痛國內戰內亂及離亂，舉國人民所遭之痛苦，未有甚於今日者。本黨此為之痛，益感責任之重大；特召集第四次全國幹部會議，集思本黨工作，以決全國問題及民主黨派前途民主團結，實現和平統一，建設獨立富強之中國。

本黨創立於民國十六年，二十年來經過三週時期之艱苦鬥爭，於十九年九月正式成立「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重中山先生之民主革命聯合政策，以回復中國革命運動，在團結人民革命政策以後，於二十四年改組本黨為「中國民族解放行動委員會」，當此民主團結與改革政治聯合抗日，以期完成全民抗戰。迨抗日戰起，京滬失陷，長期抗戰開始，本黨認真民主團結與改革政治聯合抗日之必要條件，乃於二十七年召集第三次全國幹部會議，提出抗戰時期政治主張，本黨同志即承此方針努力於抗戰與民主事業。

現在，國內外形勢依然嚴重，中國問題雖經戰爭所解決，而和平民主的要求，則已普及全國，農工人士更迫切民主，動搖於中國之和平及自身之解放。故於此次會議，接受全國同志之建議正式易名為「中國農工民主黨」，繼續完成中國革命之歷史任務而奮鬥。

本黨創立之初，其英大主張，既在於中山先生之革命精神，在本黨政治綱領中，即陳述先生即稱「本黨社會主義為吾人奮鬥之目標，吾人代表之社會階層則為農工平民大眾。就中國農工人民以及廣大平民久為封建地租及官僚壟斷所統治，使未能釋放階級階級上之權利。就百年來，國政改革運動皆由於農工

平民之要求而發生。今日國人所欲求之和平統一與民主建設，必有賴於農工平民之繼續奮鬥，七國農工平民自有其堅強之政治組織，以為與全國民主力量共同爭取勝利之武器，本黨所負荷之使命，亦端在於此。

茲將本黨正式易名之始，於簡述黨綱總及其主要政治目標外，尚有數端重申於國人：

一、吾人深信：中國社會主義之實現，必須經過民主政治之發展，今日中國人民迫切之需要實在獲得民主。雖此之故，本黨不同民主同盟的政治綱領及其時局對策，凡本黨黨員參加民選者，均須切實遵守民選的決議，為實現此項民主事業，當與全國工農結成聯合力量，進行共同的鬥爭，以求自身之解放。

二、本黨對於現階段中國經濟之改造，一貫主張首重改善農民生活，實現耕者有其田；增進工人福利，由工人參加國家生產管理，並與工商業者合作，以發展生產。當前之任務：則在於停止惡劣徵稅，減輕農民負擔，停止官僚壟斷及官商買賣之賄賂，停止內戰之厄運與失業之政治。

三、中國民族解放運動，本可完成於抗日之役，然家以當農工階級的利用外，更應進行內戰而自費其功，英帝國主義勢力更益滲入，吾人必加以抵抗，確保國家的獨立自主，以與農民手力共同維護人類之和平幸福，而免致中國淪為半殖民的危殆。（民國三十六年二月三日）

农工党第四次全国干部会议通过的《宣言》。《宣言》阐述了农工党的奋斗历程及主要政治目标，呼吁全国同胞及民主党派共同推进民主团结，实现和平统一，建设独立富强的中国。

## 投身国统区的爱国民主运动

根据四干会议的精神，农工党同志更加积极地投入到国统区的爱国民主运动中。1947年2月底，国民党强令中国共产党驻南京、重庆、上海的代表全部撤退，随即进攻延安。1947年3月12日农工党发表《对时局宣言》，指出蒋介石的所作所为将使中华民族自相残杀的悲剧愈演愈烈，针对严峻形势，农工党提出了六项主张，表达了反对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的独裁、内战、卖国政策的原则立场和坚定态度。

四干会议后，农工党继续加强与中国共产党密切合作，积极配合中国共产党开展工作。上海、南京、浙江、广东、安徽、江苏、湖北等地的农工党组织，为中国共产党根据地输送知识分子，提供情报和物资弹药，参加营救被捕的中国共产党党员，配合中国共产党开展策反工作，联合开展武装斗争，有目的地在国民党当局的党、政、军、警机关中发展农工党员，发动党

员和所联系的群众参加反蒋反美的爱国民主运动等，都取得了一定成绩。到 1948 年下半年，农工党已在 9 个省的 153 个县城建立了组织。

中国共产党代表团撤回延安前，周恩来与邓颖超借黄琪翔的上海寓所，邀请了张澜、沈钧儒、黄炎培、章伯钧等几十位各界知名人士聚会、话别。大家心情都很不平静，对蒋介石蓄意发动内战感到愤慨。在聚会上，周恩来谈笑风生，对胜利充满信心，与会的人士很受鼓舞。黄琪翔夫妇向周恩来敬酒说：祝你们早日回来，相信不久的将来大家一定能再相聚。

## 反蒋斗争转入地下 中央机关迁至香港

国民党反动当局对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充满敌意。尽管民盟主张“以民主的方式争取民主，以合法的行动争取合法的地位”，国民党当局还是不断地对其进行残酷迫害，一批著名的领导人和成员被殴打、

监视，甚至遭到逮捕、杀害。1947年5月，国民党当局在各地绑架、逮捕民主人士，农工党员多人被捕。7月初开始，蒋介石又进一步在全国强化法西斯恐怖统治。

为了反击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农工党于1947年7、8月份分别向各地组织和党员干部发出《政治通告》和《组织通告》，指示全党在严酷的白色恐怖下，严密组织，保全机构，隐蔽分散，建立据点，扩大自己，坚持斗争。

1947年10月27日，民盟被国民党当局宣布为非法团体，被强令解散，民盟领导人转赴香港。农工党的工作也被迫完全转入地下。1947年11月底，章伯钧等农工党部分领导人秘密前往香港，中央机关也随之迁至香港。在香港，农工党坚持开展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斗争，并与其它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加强团结，与中国共产党全面合作。

## 4、支援和参加人民解放战争 开展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军事运动

### 由和平民主斗争转向武装斗争

1948年秋，人民解放战争已进入决战阶段。农工党于1948年9月2日至11日，在香港举行了中央扩大会议。会议对即将建立的新中国的性质及政策进行了深入的讨论，热忱地期待着新政协的召开，积极迎接新中国的诞生。会议接受了章伯钧的《政治报告》，听取了组织、宣传等各项工作报告，通过了《政治决议》和《组织决议》。

《政治决议》分析了国内外形势，确定了斗争的策略方针，阐明了农工党与中国共产党并肩战斗和长期合作的方针，强调：“中国共产党是历史先进阶级——无产阶级坚强领导的组织，中国共产党采取新民主主义的道路，与本党历来主张以农工为中心的平民民主政权则完全相同。将来为实现社会主义的目的又是一致的。故我

们与中国共产党不仅是今天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的革命战友，而且是建设新中国的长期合作者。为了与中国共产党切实合作，本党应加紧团结农工平民大众与解放军并肩进行坚决的革命斗争，放手发动人民参加武装组织，开展武装斗争。”

中央扩大会议作出的一个重大决定，就是改变对国民党的斗争方式，由和平的民主的斗争转向武装的军事的斗争。这是根据中国共产党同志的意见作出的决策。1948年春，中国共产党方面估计：解放战争仍需要3至5年，才能胜利地完成任务。中国共产党方面的一切决策都是根据这个估计来决定的，准备首先全力解放东北，次及华北，然后西北。预备把农工党放在东南尤其是沿海各省，借以在蒋介石军队里发挥作用，搞军事运动。

## 开展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军事运动

按照中央扩大会议的决议，为了配合人民解放战争，加速胜利的进程，农工党在香港与中国共产党有关负责人建立了联系，开始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军事运动，在国统区发动人民参加革命的武装组织，在东南和西南一些地区运用自身的特点和社会关系，积极开展反蒋军事斗争：

广东省：在北江地区、兴梅地区、惠东宝地区和广州地区，建立了四支武装共3000多人，与中国共产党地方游击队密切配合，同国民党军队战斗到广东解放，农工党员黄桐华被中国共产党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粤赣边区先遣支队司令员”。

浙江省：在杭州、诸暨、金华等地分别在浙东人民解放军金萧支队、中国共产党路南六支队的领导与帮助下，组织了游击队，与当地的中国共产党的武装协同作战。其中，中国共产党帮助组建的东磐武工队，由最初的4人（3人是农工党员）发展壮大到400多人枪，编为浙东人民解放军东磐支队，由农工党员方启东任支队长，为摧

毁东磐地区的反革命武装力量和旧政权作出了重要贡献。

上海市：在上海郊区和江浙一带策反国民党部队及地方武装，组建了地下“民主联军”，预编为两个军和一个直属师，集中待命，迎接解放。直属师于1949年5月25日开到上海南市，接受人民解放军改编。

江西省：在九江、德安等20个县区组建了“江西民主自卫军”，共8000多人，其中有些纵队、支队在配合当地解放战斗中做出了突出贡献，解放了修水、九江县城，全歼九江县的国民党武装，活捉县长和警察局长，促成了德安、永修、进贤、丰城、南丰、余江、遂川等县的和平解放，农工党员于灿烈在战斗中壮烈牺牲。

湖南省：在湘西成立了3000多人的“湖南淑沅辰人民解放总队”，在中国共产党湘中地下工委的领导下，在解放军113师、117师、140师、147师等的支持帮助下，同国民党军队作战10余次，为解放湘西各

县及协助人民政府剿匪、征粮，作出了贡献。

广西省：组建了“富川游击队”，在当地开展武装斗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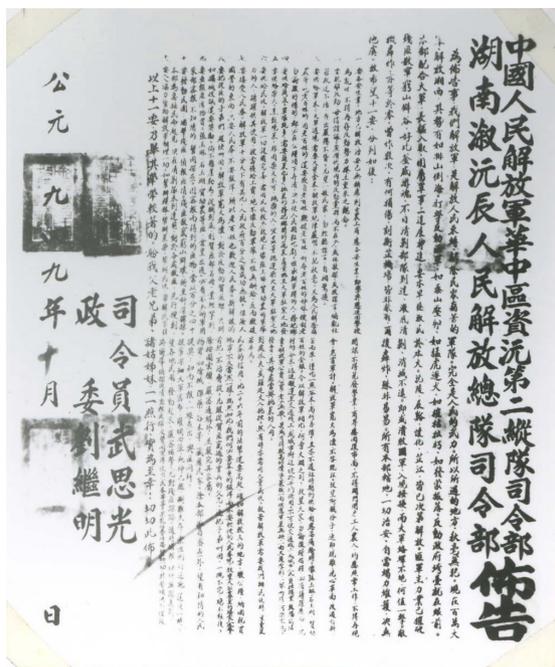
四川省：在川北以中江县为中心，组建“川北人民自卫军”，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在和国民党当局内务部第二警察总队的战斗中缴获步枪千余支，大炮10门和大批军用物资，策应配合人民解放军，瓦解国民党军残部，维持当地治安，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安徽等地也都开展了武装斗争。

1949年6月6日，章伯钧、彭泽民致电农工党江西省委，指示：“在蒋匪区域之武装组织由负责同志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接洽协助杀敌。”并强调指出：“现本党政治方针完全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在解放工作完成以后，即遵照“全国各民主党派均经一致决定凡有武装部队统交人民解放军改编”的原则办理。

中共中央对农工党的武装非常重视，1949年6月17日，中共中央作出《对江西农工党及其武装问题的指示》。其中指出：“农工民主党在江西的地方组织颇多，在赣南与我地下组织有合作关系。望慎重处理与该党有关的问题。要注意发挥该党武装配合的作用。在完成了战斗任务的地方，按商定原则，交人民解放军整编，其中农工党员之适宜于部队工作者，仍留部队工作。”

以上武装均在当地解放后按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接受了改编。



1949年10月1日，“湖南溆沅辰人民解放总队”司令部发布布告，号召民众迎接解放军进入湘西。因通过不同的途径与中国共产党党组织联系，被授予两个不同的番号，为避免误会，布告中将两个番号都列上。

## 策反蒋军起义

策动国民党军政人员起义，是由两个方面的有利形势决定的：一是由于解放战争的形势大好，国民党内部分崩离析，人心浮动。二是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帮助，为一些国民党军政人员弃暗投明提供了保证和出路。如果没有这两个先决条件，要策反也是不容易的。1948年至1949年，农工党通过本身的各种关系，发挥穿针引线作用，参与策反且收到成效的，上至集团军总司令、省政府主席，下至县长、警察总队长，计有：吴化文、马师恭、张轸、张奇、毕书文、康朴、曾伟潮、周绍轩、范绍增、邓宝珊、王安昭、叶芳、方师岳、王晏清、吴钟祺、丁锡山、李洁之、魏鉴贤、练惕生、施祥生、赵士佳、祝更生、张慕槎、谢汝昌、俞步募、林锡光，等等。以上策反工作，有的是接受中国共产党的任务，有的是先征得中国共产党的同意，

经策动成熟，再介绍与中国共产党直接联系，具体安排起义的时间和办法。

1948年9月19日，国民党96军军长吴化文率所部三个旅两万余人起义，把济南西线阵地连同该部控制的飞机场完整地交给了人民解放军，打开了解放军进入市区的大门，使解放军迅速夺取了济南战役的胜利，从而揭开了淮海战役胜利的序幕。策动吴化文率部起义，经过了几年的长期的酝酿和准备，农工党是重要穿线人，民革力促推动，中国共产党做了大量工作。1948年9月12日，中国共产党代表到济南与吴化文单独会谈，并传达毛泽东电函，“时机已到”，应该“行动起来，为人民立功”。起义随即发动。

1948年至1949年，农工党先后策动了89军马师恭部在芜湖起义，安徽省保安司令、代理省主席方师岳在屯溪起义，叶芳在温州起义等。农工党干部邓昊明，在中国共产党地下党帮助下，成功策反其外甥——国民党首都警卫师师长王晏清起义，

震动全国，动摇了蒋军心理防线。江苏南京农工党地下组织成功迫使国民党中校特务组长弃暗投明，向中国共产党方面提供了不少有关特务头子毛人凤布置潜伏的重要情报。江阴要塞是蒋军阻止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的重要防御系统，南京农工党地下组织成功发展江阴要塞黄山炮台第六中台台长吴钟祺加入农工党，吴钟祺在解放军渡江的关键时刻率部起义。

### **搜集军事情报，破坏蒋军作战**

1946年6月，农工党按照与中国共产党方面商议的意见，安排党员刘宗宽打入国民党重庆行营，以便在敌人内部发挥作用。1949年，担任国民党西南军政长官公署代参谋长的刘宗宽，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司令部秘密派遣的情报员指导下，将国民党西南地区的军事情况，包括军队部署、战斗序列、人员配备、指挥官特征、训练程度、武器装备等重要情报，详细提供给第二野战军。刘宗宽还借西南军政长

官公署重新调整军事部署之机，利用敌人内部的矛盾，成功引导国民党当局作出错误判断，将大批国民党军队从川东调往川北，使川鄂湘黔交界地带出现“空防”。第二野战军从“空防”留下的 80 公里宽的空隙顺利进入四川，加速了解放西南的进程。刘宗宽还向第二野战军司令部提供了蒋介石“保卫重庆决战”的绝密情报，并提出迅速解放贵州，截断国民党军队向云南撤退后路的重要建议。刘宗宽所做的系列重要工作，为人民解放军解放大西南提供了有利支持，被刘伯承司令员誉为“解放西南第一功”。刘宗宽本人也被第二野战军司令部聘为高级参议。

农工党运用自身有利条件，在搜集敌人情报方面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从 1948 年到 1949 年搜集到的军政情报主要有：广州绥署兵力部署情况和作战计划、国防部重要情况和作战计划、南京市城防工事地图、军令部 1948 年后备兵力统计、南京市保密局特务名单和活动情况、毛人凤布置追踪

曾山的情报、芜湖专署进攻当地游击队的计划、敌人封锁长江的通讯口令、“珠江三角洲反共救国军”作战计划、国民党特务撤往台湾前秘密在南京设立的两座电台、广州地区陆海空军日夜联络讯号表、国民党在复兴岛召开高级军官会议的决议、长江江防工事和兵力部署情况，等等。

### 组织护厂护校，迎接人民解放

农工党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策，组织开展迎接人民解放的各项工作。1949年2月农工党中央向全党发出指示：（一）大力开展城市的组织工作和民主活动。（二）掌握地方人民武装。（三）策反国民党军人起义。（四）扩大宣传，安定人心，保护一切地方公物、资产、财物。（五）组织城乡人民迎接解放军。这一指示下达后，农工党各地组织都把迎接解放作为工作重点，积极贯彻执行。尤其是江南各省市的各级组织，普遍开展了“三护”、“三保”、“三支”、“三劝”活动。（一）三护：护厂、护

仓、护校。维护了一些工厂不被拆迁，守住了不少库存的粮食和军械弹药免遭散失，阻止了一些高等院校不被迁移。(二)三保：保产、保资、保物。保护了不少公用设施(如电灯、自来水、邮政、电话等)，保住了一些银行和钱庄的资财(如黄金、白银、银元等)，保全了大量的档案和资料。(三)三支：发动群众为解放军进军修路修桥，筹粮筹草，送鞋送伞。(四)三劝：劝一些工商业者不去香港，劝一些国民党军政人员不跑台湾，劝一些中上层职员坚守岗位。

1949年初，担任安徽省桐城县县长的农工党员陈质夫，控制民船600只，转存粮食28万斤，食盐5000余斤，留供人民解放军使用。

1949年3月，上海得利车行(上海最大的自行车商店)准备搬迁到台湾。得利车行的农工党地下组织号召职工进行怠工斗争，阻止搬迁，并发动工潮，影响到上

海全市的自行车行业。经过谈判，得利车行没能迁往台湾。

1949年3月，担任上海市虹口区区长的农工党员黄芝宇和农工党虹口区小组的党员陈旭东、陈旭昌及所联系的进步群众，秘密将档案、户口簿册保留下来，大部分资财也及时转移到安全地点，解放后完整地交给人民政府。

1949年3月，上海市常熟区的农工党员简恩霖，和中国共产党党员徐嘉陵，对常熟区区长王伯盘进行政策宣传，使王伯盘打消了逃去台湾的念头，将所有档案、户口簿册保存完好。

1949年3、4月间，农工党南京市雨花台区组织，将看管的西善桥仓库的子弹炮弹两万多发、停泊的军舰设施及收缴的轻机枪1挺、步枪98枝、手枪6枝等军用物资全部移交人民解放军接收。

1949年3、4月间，农工党南京市栖霞区北郊分部，将缴获、收集的电台1部、

机枪 2 挺、冲锋枪 2 枝、步枪 39 枝及弹药装具等，全部移交人民解放军接收。

1949 年 5 月，人民解放军进攻上海时，农工党上海市党部集中 40 余人在沪西迎接人民解放军进城，张贴迎接人民解放军的标语，协助维持社会秩序，在作战区域外进行警戒和宣传工作，为人民解放军做向导，筹措粮食等。

1949 年 9、10 月间，福建厦门的农工党员郑静安等人，利用在当地的 relation 和影响，组织农工党员和当地青年 40 余人组建“船管大队”，在人民解放军解放厦门、鼓浪屿的战役中，担负了运输人民解放军 91 师 271 团渡海作战的任务。

这些成绩的取得，一般都经过不同方式和不同程度的斗争，有的还付出了一定的代价，有些农工党员为此被殴打，被逮捕，甚至献出了生命。

中国共产党非常重视民主党派在接管城市、恢复生产、恢复社会秩序中发挥的作用。1949 年 2 月 19 日，中共中央发出《关

于怎样对待各民主党派、团体的地方组织的指示》，指出：在“五一号召”以前即已成立并在反对帝、封、官的革命斗争中做出了贡献的民主党派，“亦即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民主同盟、中国民主促进会、人民救国会、农工民主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国民党民主促进会、民主建国会、致公党等。在被我人民解放军解放了的地方，并经过该党派总部的证明，应一律承认他们的合法地位，加以保护”。指示要求中国共产党各地方组织要“以坦白诚恳的态度，向他们解释我党的政策和主张，与之协商一切重大问题，以争取他们同我党一道前进。”

1949年4月23日，在人民解放军胜利完成渡江作战，解放了南京并将革命大踏步推向江南的形势下，会聚北平的各民主党派发表《拥护毛主席，朱总司令进军令的联合声明》，号召“在一切解放区，全体人民必须加紧生产，服从法令，动员支前，在解放军作战之区域，及将进攻之区域，

所有各民主党派及各界人民必须努力动员迎接解放大军，协助杀敌，并保护一切重要物资，免受破坏。”声明发布后，各民主党派在全国各地区更为加紧工作，组织恢复生产生活秩序，积极参加接管工作，为巩固和扩大革命胜利成果，为稳定人民新生政权，做出重要贡献。

### 重要的贡献，光辉的一页

参加抗日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的艰苦斗争，是农工党历史的光辉一页。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农工党同中国共产党亲密合作，在斗争中不少农工党员同共产党人的鲜血流在了一起。众多农工党员颠沛流离，经受着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双重折磨，有的遭到逮捕身受酷刑，有的献出了宝贵生命。

在壮烈牺牲的革命者中，有被蒋介石杀害的农工党创始人邓演达，有在“福建事变”中英勇牺牲的徐名鸿、江董琴、翁慈星、颜卧云、周捷榜、冯峻五、丘弼琴，

有在与日寇作战中壮烈牺牲的八路军冀鲁豫军区第五军分区司令员朱程，有在开展抗日游击斗争中被日寇虐杀的王守先，有在做策反工作时被捕遇害的农工党中央委员曾伟、上海市党部主委虞键、南京市党部委员刘启纶，有在从事革命宣传工作中在上海解放前夕被敌人杀害的农工党上海市党部宣传委员会主任焦伯荣、上海市党部青年运动委员会主任赵寿先、委员郑显芝。农工党四川省党部青年工作委员会委员章培毅，在开展军事策反活动中被捕；张孟晋受中国共产党地下党指示，在为支援华蓥山武装起义到香港筹款返渝时被捕，章培毅和张孟晋都在重庆解放前夕被活活烧死在渣滓洞监狱，牺牲时同为 29 岁。农工党西南地区组织工作负责人黎又霖，长期在国民党上层军政人士中开展工作，被捕后受尽酷刑，坚贞不屈，在重庆白公馆英勇就义。在各个时期中牺牲的烈士还有：林熙盛、何莫、裘朝慎、李义容、裘朝俭、章禹鼎、彭象贤、王绍、王直、郭

莽西、于灿烈、边美棠、周永良、宋无畏、黄立本、屠泽民、沈德尊、吴一均、何华昌、古诚等百余人。他们有的是在刑场上慷慨赴死，有的是在战场上英勇捐躯，他们都是可歌可泣的革命英烈，都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



在上海龙华烈士纪念馆展出的农工党员烈士事迹和史料，从左至右为：曾伟、虞键、郭莽西、赵寿先、郑显芝、焦伯荣、刘启纶。

## 五、应中国共产党邀请 参加新政协 筹建新中国

### 1、响应中国共产党“五一”口号，作出政治抉择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郑重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其中第五条提议：“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这一号召表达了全国人民的要求和愿望，反映了各民主党派和爱国民主人士的政治主张，受到各民主党派和各阶层人士的热烈拥护和积极响应。

5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邀请各民主党派代表来解放区协商召开新政协问题的指示》，电示中国共产党上海局、香港分局：“我党准备邀请各民主党派及重要人民团体的代表来解放区讨论：（甲）关于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及成立民主联合政府问题。（乙）关于在反对美国帝国主义侵略及蒋介石卖国政府的斗争中加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合作及纲领政策问题。”并点名邀请李济深、冯玉祥、何香凝、李章达、柳亚子、谭平山、沈钧儒、章伯钧、彭泽民等20多位民主党派领导人和民主人士到解放区开会。

在人民军队转入战略进攻的形势下，在国民党反动统治行将崩溃的前夕，中国共产党为建立一个和平民主的新中国，向多年以来风雨同舟、肝胆相照的各民主党派及民主人士发出号召，邀请他们到解放区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共商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及施政纲领等大计，极大地鼓舞了在

国统区和香港等地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艰苦斗争的各民主党派及民主人士。

1948年5月5日，彭泽民代表农工党，与其他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在香港联合致电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响应中国共产党“五一”口号。并向国内外各报馆、各团体及全国同胞发出《响应中国共产党“五一”号召的通电》，表示：“中国共产党“五一”号召事关国家民族前途，至为重要。全国人士自宜迅速集中意志，研讨办法，以期根绝反动，实现民主。”6月16日，农工党又单独发表《对时局宣言》响应中国共产党“五一”号召，以示竭诚。

各民主党派响应“五一”号召，宣传“五一”号召，纷纷发表文章，召开讨论会，举行座谈会，围绕召开新政协问题“贡献意见”，“研究办法”，形成了一个广泛深入的“新政协运动”。通过“新政协运动”，分清了新政协与旧政协的本质不同；在如何对待国民党反动派独裁政权的问题上进一步统一了认识；明确了新政协是各民主

党派、人民团体及各界人民的政治协商会，它拒绝反动派参加，而且中国共产党是新政协的当然领导者；将在新政协产生的共同纲领，应该是新民主主义的政纲；为着新政协的召开，各民主党派必须立即行动起来，与全国人民一道，将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进行到底。

中国共产党的“五一”口号和新政协运动，指明了民主党派向着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胜利前进的具体道路，团结了国民党区域一切革命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的中国人民广泛的统一战线已进入一个新阶段。从此，农工党同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在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帮助下，积极参加新政协运动，讨论有关召开新政协会议的各项议题，为结束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建立人民民主的新中国而努力。

# 各民主黨派民主人士

# 通電全國與中共

# 籌開新政協會

# 新加坡僑團擁護中共號召

【本報訊】日僑務部於四月廿二日，接獲新加坡僑團擁護中共號召，各民主黨派民主人士，聯名致電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積極響應“五一”號召，籌開新政協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正與民主黨派和民主人士之要求相符合。日昨，齊深、何應欽（國民黨委員），沈鈞儒、章伯鈞（中國民主同盟），馬敘倫、王寵惠（中法民進會），陳其尤（公黨），彭澤民（中國農民主聯，中華總商會），陳其尤（公黨），彭澤民（中國農民主聯，中華總商會）和章伯鈞（無黨無派）隨此為此特致電中共主席毛澤東，並通電海外，號召國人共同響應。該電全文如下：「鑒於當前形勢，僑團擁護中共號召，積極響應“五一”號召，籌開新政協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正與民主黨派和民主人士之要求相符合。日昨，齊深、何應欽（國民黨委員），沈鈞儒、章伯鈞（中國民主同盟），馬敘倫、王寵惠（中法民進會），陳其尤（公黨），彭澤民（中國農民主聯，中華總商會）和章伯鈞（無黨無派）隨此為此特致電中共主席毛澤東，並通電海外，號召國人共同響應。該電全文如下：」

通電全國

【本報訊】日僑務部於四月廿二日，接獲新加坡僑團擁護中共號召，各民主黨派民主人士，聯名致電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積極響應“五一”號召，籌開新政協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正與民主黨派和民主人士之要求相符合。日昨，齊深、何應欽（國民黨委員），沈鈞儒、章伯鈞（中國民主同盟），馬敘倫、王寵惠（中法民進會），陳其尤（公黨），彭澤民（中國農民主聯，中華總商會）和章伯鈞（無黨無派）隨此為此特致電中共主席毛澤東，並通電海外，號召國人共同響應。該電全文如下：「鑒於當前形勢，僑團擁護中共號召，積極響應“五一”號召，籌開新政協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正與民主黨派和民主人士之要求相符合。日昨，齊深、何應欽（國民黨委員），沈鈞儒、章伯鈞（中國民主同盟），馬敘倫、王寵惠（中法民進會），陳其尤（公黨），彭澤民（中國農民主聯，中華總商會）和章伯鈞（無黨無派）隨此為此特致電中共主席毛澤東，並通電海外，號召國人共同響應。該電全文如下：」

致電中共

【本報訊】日僑務部於四月廿二日，接獲新加坡僑團擁護中共號召，各民主黨派民主人士，聯名致電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積極響應“五一”號召，籌開新政協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正與民主黨派和民主人士之要求相符合。日昨，齊深、何應欽（國民黨委員），沈鈞儒、章伯鈞（中國民主同盟），馬敘倫、王寵惠（中法民進會），陳其尤（公黨），彭澤民（中國農民主聯，中華總商會）和章伯鈞（無黨無派）隨此為此特致電中共主席毛澤東，並通電海外，號召國人共同響應。該電全文如下：「鑒於當前形勢，僑團擁護中共號召，積極響應“五一”號召，籌開新政協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正與民主黨派和民主人士之要求相符合。日昨，齊深、何應欽（國民黨委員），沈鈞儒、章伯鈞（中國民主同盟），馬敘倫、王寵惠（中法民進會），陳其尤（公黨），彭澤民（中國農民主聯，中華總商會）和章伯鈞（無黨無派）隨此為此特致電中共主席毛澤東，並通電海外，號召國人共同響應。該電全文如下：」

通電全國

1948年5月5日，彭泽民代表农工党，章伯鈞以民盟领导人身份，同各民主党派暨爱国民主人士，联名致电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积极响应“五一”口号。图为6日《华商报》上刊登的电文。

## 2、应中国共产党的邀请北上参加筹备新政协

章伯钧、彭泽民、丘哲、严信民、韩兆鹗先后到达解放区

中共中央十分重视社会各界对中国共产党“五一”口号的回应。1948年8月1日，毛主席主席复电李济深等人，对他们赞同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并热心促其实现，表示“极为钦佩”，诚恳表示：“关于召集此项会议的时机、地点、何人召集、参加会议者的范围以及会议应讨论的问题等项，希望诸先生及全国各界民主人士共同研讨，并以卓见见示，……”中共中央指示华南分局、香港工委、上海局、华北局等做好民主党派领导人和民主人士进入解放区的组织接待工作。

筹备新政协的首要问题就是如何将解放区以外，尤其是在香港的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及民主人士的代表接送到解放区，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从1948年秋开始，由中共中央直接部署、周恩来亲自指挥，中国共产党华南分局、香港工委，及中国共产党派赴香港工作的钱之光具体负责这项具有历史意义的工作。从1948年秋到1949年3月，通过北南两线分六批将民主党派领导人和著名爱国民主人士分别接送到华北和东北解放区。农工党章伯钧、彭泽民、丘哲、严信民、韩兆鹗先后到达解放区。民主党派领导人及民主人士到达解放区后，通过参观学习，了解解放区的情况，学习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并分别在东北解放区的哈尔滨和华北解放区的河北平山县李家庄，就新政协有关事宜进行具体酝酿和讨论。



1948年9月29日，第一批从香港北上参加新政协筹备会议的民主党派负责人沈钧儒、谭平山、章伯钧、蔡廷锴四人到达哈尔滨。图为9月30日他们与中国共产党代表及其他民主人士在哈尔滨合影，前排左起：李立三、谭平山、沈钧儒、李德全、蔡廷锴；后排左二朱学范、左三章伯钧（农工党中央执委会主席）、左五赖亚力。

## 痛斥“和平”阴谋，拥护将革命进行到底

在民主党派领导人和民主人士通过北南两线陆续到达华北和东北解放区期间，以毛泽东主席为核心的中共中央连续组织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国民党政权在长江以北的力量全线崩溃。蒋介石和国民党统治集团为挽回败局，在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的支持和策划下，发动了一场“和平攻势”，企图利用和平谈判的手段，达到“划江而治”的目的，以便争取喘息时间，保存力量，卷土重来。

对于这场主要由桂系势力掀起所谓“和平攻势”，已经破产的“中间路线”的主张，又被某些地方实力派和民主党派的右翼分子重新提了出来。面对这个尖锐的问题，1948年12月30日，毛泽东主席为新华社撰写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献词，提出：“是将革命进行到底呢，还是使革命半途而废呢？”“中国每一个民主党

派，每一个人民团体，都必须考虑这个问题，都必须选择自己要走的路，都必须表明自己的态度。”并号召全国人民、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真诚合作，采取一致的步骤，粉碎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政治阴谋，将革命进行到底。1月14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主席名义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提出了和平谈判的“八项条件”。

在“是将革命进行到底，还是使革命半途而废”的重大原则问题上，各民主党派同中国共产党坚定地站在一起。农工党领导人章伯钧、彭泽民、丘哲、严信民、韩兆鹗和各方面的民主人士认真讨论了毛泽东的文章，纷纷发表声明，拥护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的主张，痛斥和回击美蒋反动派的和平阴谋。1月25日，农工党中央发言人发表谈话，指出：“毛泽东先生1月14日的《时局声明》严正的揭破了蒋介石等虚伪的反动的和平建议”，“代表了全国人民全国各民主党派一致的要求，唯

有这八项条件才能符合人民的利益”。“毛先生的号召，也即是今天各民主党派和全国人民共同的任务。”到达解放区的农工党领导人章伯钧、彭泽民、丘哲、严信民、韩兆鹗同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民主人士 55 人，于 1949 年 1 月 22 日联名发表《对时局的意见》，旗帜鲜明地指出：“我们今天要明白表示我们的信念。我们认为，革命必须贯彻到底，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绝无妥协与调和之可能。”“今天是我们中国人民的最后的考验。我们相信，我们多灾多难的中国人民决不会再受蒋美反动阴谋的欺骗。”“我们敢于相信，把反动政权摧毁以后，我们能以较短的期间建设成一个和平、民主、自由的新中国，人民民主共和国。光明的远景在我们的前面，我们应一致努力。”并明确宣告：“愿在中共领导下”，为推进中国革命和建设新中国而贡献自己的力量。

## 参加《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的协商讨论

1948年9月29日，第一批民主党派人士抵达哈尔滨的当天，毛泽东主席就亲自发出欢迎电报，并指示周恩来草拟《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的文件，经毛泽东主席修改后，以中共中央名义电致东北局，指示东北局将该文件转交各位民主人士每人一份，正式征求他们的意见。10月15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向各民主党派代表征询参加新政协名单的意见及有关原则给李富春同志的指示》，指示李富春等征询在哈尔滨民主党派人士的意见。

10月至11月间，中国共产党东北局负责人邀集在哈民主党派领导人及民主人士就《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草案)举行了三次座谈会。与会各位均表示同意中共中央的主张和意见。关于召开新政协的原则，一致同意“排除南京一切

反动党派及反动分子的主张”。对于新政协由各党派、各方面共同组织筹备会负责召集，均表示很满意。与会人士还就“筹备会的组成问题”、“新政协的参加者问题”、“新政协重要讨论事项问题”、“如何成立中央政府问题”等提出了意见。经中共中央与到达哈尔滨、平山县的民主党派及民主人士反复协商，就《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达成共同协议，决定新政协筹备会由中国共产党及赞成中国共产党“五一”口号第五项的各主要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及无党派民主人士等 23 个单位代表组成。新政协的参加范围由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人物组成。新政协应讨论和实现的有两项重要问题：一为共同纲领问题，一为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问题。



1948年10月21日、11月15日、11月25日，中国共产党东北局负责人同在哈尔滨的民主党派领导人及民主人士，就《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草案）举行了三次座谈会。图为座谈会会场（马迭尔宾馆二楼一号会议室）。

## 参加筹备新政协的具体工作

1949年6月15日至19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中南海勤政殿开幕。参加会议的有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及人民团体等23个组织共134人。16日，会议讨论通过了《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组织条例》，规定新政治协商会议由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建国会、无党派民主人士、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国人民救国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中国致公党等23个党派组织组成。筹备会的中心任务为：(1)商定并邀请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之单位和代表；(2)决定新政治协商会议开会之时间、地点及议程；(3)拟定新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条例草案；(4)制定共同纲领草案；(5)提出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之方案。

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设立常委会，处理日常工作，常委 21 人，包括常委会主任毛泽东、副主任周恩来等，章伯钧为常委之一。常委会设 6 个小组，章伯钧任第一小组副组长。第一小组负责拟定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之单位及其代表名额，组长为李维汉。农工党领导人还分别参加了其它小组的工作，参与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等重要文件的起草工作。

1949 年 6 月 30 日，毛泽东主席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回顾中国革命的奋斗历程，指出：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是行不通的，我们所要建立的新中国，只能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主席关于人民民主专政的思想，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为人民政协制定《共同纲领》提供了指导，为即将成立的新中国作了政治理论准备。

新政协筹备会的组织及筹备工作，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在筹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伟大事业中的亲密合作。

### **3、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召开。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盛会。在普选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之前，政协全体会议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

1949年9月21日下午7时，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开幕。共有45个单位、662名代表参会。有20位农工党员出席会议。代表农工党参加会议的正式代表10人，分别是：彭泽民、郭冠杰、李士豪、何世琨、杨逸

棠、张云川、郭则沉、王深林、严信民、杨子恒。候补代表2人：王一帆、李健生（女）。代表华东、华南、西北解放区的代表3人：季方、李伯球、韩兆鹗。特邀代表2人：黄琪翔、邓昊明。无党派人士候补代表1人：周谷城。章伯钧、丘哲作为民盟的代表出席会议。农工党的领导人分别参加了政协组织法草案整理委员会、共同纲领草案整理委员会、政府组织法整理委员会、宣言起草委员会、国旗国徽国都纪年方案审查委员会的工作，直接参加了筹建新中国的实际工作。

开幕会上，毛泽东主席致开幕词，他庄严地向全世界宣告：“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的民族将从此列入爱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劳的姿态工作着，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时也促进世界的和平和自由。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让那些内外反动派在我们面前发抖罢，让

他们去说我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罢，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努力，必将稳步地达到自己的目的。”

9月24日，农工党首席代表彭泽民在大会上发言。他首先表达了拥护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的诚意，高度评价了《共同纲领》，并指出：“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的三民主义，1924年国民党改组宣言，以至1930年邓演达先生宣布的农工党的基本政治主张，政纲和政策的要点，不仅全部包括在这个《共同纲领》里面，而且使之向前发展，更加提高，并作出更具体更恰当更切合实际的决定。因此我们农工党全党的同志，今后要永远跟着共产党，努力参加实现《共同纲领》的工作，并且把我们一同带到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去。”彭泽民还表示，要接受政协三大文件，并促成其彻底实现，坚决拥护刘少奇同志提出的“不仅在新民主主义时期，就是走向社会主义还愿与大家一道”的建议，接受中国

共产党的领导，与中国共产党长期合作下去。

9月30日，会议选出了以毛泽东为主席的由180人组成的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民主党派成员有60多人当选，章伯钧、郭冠杰分别当选为全国政协常委、委员。



1949年9月，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农工党代表合影。前排左起：李士豪、李健生、郭冠杰、彭泽民、王一帆、郭则沉；后排左起：杨子恒、杨逸棠、严信民、王深林、张云川、何世琨。其中，李健生、王一帆为候补代表。



1949年9月24日，农工党首席代表彭泽民代表农工党在全国政协一届全体会议上发言。

#### 4、参加新中国人民政权

9月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选举产生了由63人组成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毛泽东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为副主席。在当选的56名政府委员中，有包括彭泽民、章伯钧在内的民主人士27人。

10月1日下午2时，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在北京中南海勤政殿举行首次会议，宣布就职。委员会推选林伯渠为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任命周恩来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沈钧儒为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罗荣桓为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决定接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中央人民政府施政方针；决定向各外国政府宣布中

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为唯一合法政府，并愿意与各国建立平等的外交关系。

10月1日下午3时，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参加者30余万人。毛泽东主席亲手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红旗，宣读了《中央人民政府公告》。朱德总司令宣读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命令》。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光荣诞生。

10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举行第三次会议。任命董必武、陈云、郭沫若、黄炎培为政务院副总理。在政务院32个部级单位的正职负责人中，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占13名。农工党领导人章伯钧任交通部部长，季方任交通部副部长，彭泽民任政务院政法委员会副主任。还有一大批农工党同志在各省、市、区人民政府担任领导职务。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胜利召开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中国人民经过长期的奋斗取得的胜利

成果，农工党等民主党派为此做出了重要贡献。农工党等民主党派参加人民政权，是对农工党等民主党派抗日反蒋革命历史的充分肯定。从此，农工党等民主党派成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参加人民政权的新型政党，踏上了同中国共产党肝胆相照、竭诚合作建设新中国的崭新历史道路。



1949年9月30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农工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章伯钧、农工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彭泽民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图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合影。三排右三为章伯钧、二排右七为彭泽民。

## 六、致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

### 1、中共中央高度关心重视民主党派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正式确立。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巩固和发展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共中央统战部于1950年3月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了第一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会上，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作了题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新形势与新任务》的报告，就建国初期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形势和任务以及各方面工作的基本政策作了明确的阐述。指明新中国成立后，统一战线已经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其主要任务是争取尽可能多的力量，为实现《共同纲领》，为着

稳步地实现中国共产党在新时期的历史任务而奋斗。阐明了民主党派的性质、作用和中国共产党对民主党派的基本方针政策。统战工作会议期间，周恩来总理两次到会作报告，就大家在讨论中争论较多的问题作了回答。关于民主党派，周恩来总理指出：各个民主党派，不论名称叫什么，仍然是政党。政党都有一定代表性。但不能用英美的政党标准衡量他们，他们是从中国的土壤中生长出来的。周恩来总理进一步指出：我国的人民民主专政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政权，民主党派在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中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

毛泽东主席在听了统战工作会议的汇报后，针对会议中反映出来的问题明确指出：“要充分看到民主党派的作用。有人认为民主党派只是一根头发的功劳，一根头发拔不拔去都没有什么关系。这种说法是不对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是联系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从他们的背后联系

看，就不是一根头发，而是一把头发，就不可藐视。从整体看，从长远看，必须要民主党派，要把民主党派的干部看成跟我们的干部一样，手掌手背都是肉，不能有厚薄。对他们要平等，不能莲花出水有高低。”他还特别指出：“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中国工人阶级单求得自己的解放不行，必须求得四个阶级的共同解放。”毛泽东主席的这段话，把多党合作提到了一个新的认识高度。

1956年初，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不断取得胜利的形势下，中共中央开始把党和国家工作的着重点向社会主义建设方面转移。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主席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其中第七部分专门阐述了党和非党的关系。他说：“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如今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是毛泽东主席关于多

党合作思想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升华发展，它为社会主义整个历史阶段中国共产党团结民主党派实行长期合作奠定了理论基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得到确立。



1956年5月2日，毛泽东主席在第七次最高国务会议上作《论十大关系》的报告，提出共产党与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

## 2、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农工党于1949年11月在北京召开了第五次全国干部会议，明确提出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以政协《共同纲领》为行动纲领，表示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努力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努力于新民主主义的建设”。随后，农工党积极投身巩固人民政权和恢复国民经济的工作，先后参加了土地改革、抗美援朝和镇压反革命运动，参加了“三反”、“五反”和增产节约运动。1956年，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社会主义制度基本确立，中国共产党在总结我国多党合作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同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在这一方针的指引下，农工党努力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新贡献。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在改革开放进程中不断创新和发展。1979

年 10 月，邓小平同志指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行多党派的合作，这是我国具体历史条件和现实条件所决定的，也是我国政治制度中的一个特点和优势”，从而把多党合作纳入政治制度的范畴。1989 年 12 月 30 日，中共中央颁发《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明确了民主党派的参政党地位。1993 年，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写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成为国家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2005 年 2 月，中共中央颁发《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意见》，多党合作的制度化建设进一步加强。2015 年 5 月，中共中央颁布《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条例》明确了民主党派的性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扩展了民主党派的职能，增加了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协商；拓宽了政治协商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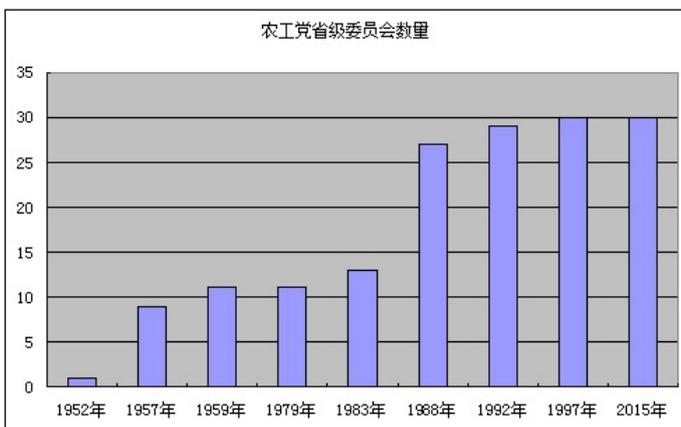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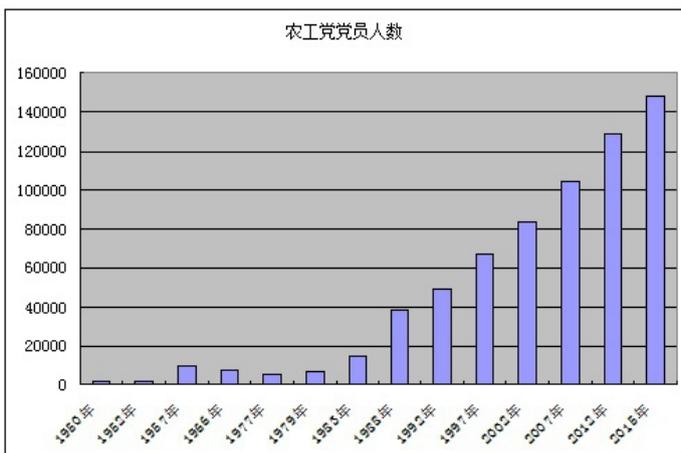
渠道，民主党派负责人可以直接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约谈协商；明确了民主监督的十种形式。对民主党派负责人和代表人士的政治安排、实职安排力度进一步加大，充分体现了中共中央对民主党派的信任和支持。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事业的发展，为农工党发挥作用提供了广阔的舞台。新时期以来，季方、周谷城、卢嘉锡、蒋正华、桑国卫、陈竺主席，方荣欣、李蒙、陈宗兴、刘晓峰常务副主席等农工党中央领导人，带领各级组织和广大党员，坚持把发展作为参政议政的第一要务，通过参加中共中央、国务院组织的各类高层协商会议，在政协提交提案和作大会发言，在深入调研基础上报送专报、社情民意信息，以及开展民主监督和社会服务工作等方式，认真履行参政党职能。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农工党中央先后向中共中央、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振兴和发展中药事业的建议书》、《关于尽快兴建（福建龙岩）

棉花滩水电站的建议》、《关于在西藏等西部省区加强广播覆盖能力，以抵制境外电台广播的建议》、《关于设立“基层卫生机构医疗器械装备技术改造”和“医疗器械创制”专项，提升基层医疗服务能力，拉动内需的建议》、《关于积极应对区域灰霾污染的有关工作建议》、《关于〈基本医疗卫生法〉立法基本原则和重点内容的有关建议》、《关于动员社会力量促进健康服务业发展的建议》、《深化医学教育改革，筑牢“健康中国”人才之基》等。中共中央、国务院领导同志对农工党中央提出的意见和建议高度重视，作出重要批示，有的被吸收到国家有关规划、政策和职能部门的工作中，为促进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加快发展作出了贡献。

建设一个始终坚持与中国共产党长期亲密合作、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参政党，是农工党自身建设的根本目标。农工党坚持把思想建设作为政治交接的重要任务，坚持正确的政治立场和政治方向，

始终保持政治联盟的进步性，始终作为一支积极健康的力量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作用。到2016年底，农工党员人数由1979年的约7000人发展到154524人，2256名党员当选各级人大代表，12121名党员担任各级政协委员，1049名党员在政府和司法机关担任处级以上领导职务，许多党员受聘担任各级政府参事、特约检察员、监察员、审计员、教育督导员等，他们在各自岗位上依法履行职责，努力创造新业绩，不断做出新贡献，每年都有大批党员获得国家级、省部级荣誉称号及重大科研成果奖项，为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突出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农工党党员人数和省级委员会数量发展概况。

### 3、继往开来续写新篇章

2015年9月15日，农工党中央在上海第一次全国干部会议会址召开第十五届十五次中央主席会议。85年前，邓演达等农工党前辈在这里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干部会议，创立了中国农工民主党，明确提出了武力推翻蒋介石政权，“解放中国民族，建立平民政权，实现社会主义”的奋斗目标。85年来，农工党走过了从爱国主义到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光辉历程，同中国共产党建立了深厚情谊和亲密合作关系，中共中央对农工党的历史高度评价。85年后的今天，农工党中央在这里召开中央主席会议，具有深刻的意义。一是表达了对邓演达等革命前辈的深切缅怀；二是表达了继承和发扬爱国革命优良传统的信念与决心。

2015年9月17日，中国农工民主党第一次全国干部会议会址修缮和布展暨党史教育基地揭幕仪式在上海黄浦区淡水路332

弄1号隆重举行。陈竺主席在致辞中说：“今天，农工党前辈所追求的目标，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早已经实现。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开创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中华儿女共享了祖国强大的荣耀与尊严。邓演达等前辈创建的农工党，已经发展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成为中国多党合作事业的重要部分，正在国家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新中国的发展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伟大的成就，说明中国的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适合中国国情，能够保障政治稳定、促进经济社会繁荣发展的好制度。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农工党同志为能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

度中发挥作用，感到非常自豪，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

农工党发展的历史，是顺应时代要求不断前进的历史，是逐步走上同中国共产党团结合作、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历史，是始终为中华民族解放事业和新中国建设事业贡献力量的历史。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形成了农工党的优良传统，主要有：追求真理、不断进步的传统；与中国共产党亲密合作、团结奋斗的传统；热爱祖国、无私奉献的传统；热爱组织、培育新人的传统；自我教育、严于律己的传统。这些优良传统，是农工党的宝贵财富，也是农工党的重要价值追求。

我们要永远学习邓演达等革命前辈的高尚情操和爱国革命精神。我们要永远继承和发扬农工党老一辈领导人同中国共产党亲密合作的优良传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是农工党最大的政治共识。接受和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农工党的正确选

择和主要经验。我们要始终坚持正确的政治立场和政治方向，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在为国分忧、为民解困中发挥好参政党作用，努力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2015年9月17日，在农工党一干会址修缮和布展暨党史教育基地揭幕仪式上，农工党十五届中央主席、副主席，与部分一干会议参会人员的亲属代表合影。

## **附录：中国农工民主党历届中央主席（主要领导人）、中央常务副主席简介**



邓演达（1895—1931），字择生，广东惠阳人。农工党创始人。

1909年入广东陆军小学。1911年加入同盟会。1919年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1920年后，历任粤军第一师参谋兼独立营营长、第三团团团长。1924年先后任黄埔军校筹备委员、黄埔军校教练部

副主任兼学生总队队长。同年冬赴德国研习政治经济。1925年底回国出席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并任黄埔军校教育长。北伐战争期间，任北伐军（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北伐军占领武汉后，兼任湖北省政务委员会主任和北伐军武汉行营主任，是武汉国民政府中著名的国民党左派领导人。1927年3月，出席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中央军委主席团成员和农民部部长，并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主任。大革命失败后流亡至苏联，并赴欧亚诸国考察。1930年5月秘密回到上海，1930年8月9日在上海主持召开农工党第一次全国干部会议，任中央干部会总干事。主张反帝反封建，推翻南京政权。1931年8月正准备武装起义时，因叛徒告密在上海被捕，同年11月29日被国民党当局杀害于南京。



黄琪翔（1898—1970），字御行，广东梅县人。农工党第二届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临时执行委员会总书记）。农工党第五届中央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秘书长、副主席。

1919年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1924年加入中国国民党。北伐战争时任

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团长、师长、军长。1930年8月9日出席农工党第一次全国干部会议，当选为中央干部会干事。1933年参与策动“福建事变”，任“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军事参谋团代主任。上海“八·一三”抗战时，任第八集团军副总司令、总司令。1938年后，历任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军训部次长，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第六战区副司令长官、中国远征军副司令长官等职。1947年，任国民政府驻德国军事代表团团长。1948年回国述职后赴香港开展民主运动。1949年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1949年后历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兼司法部部长，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政法委员会委员，国防委员会委员，国家体委副主任等职。是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一、二、三届全国政协常委，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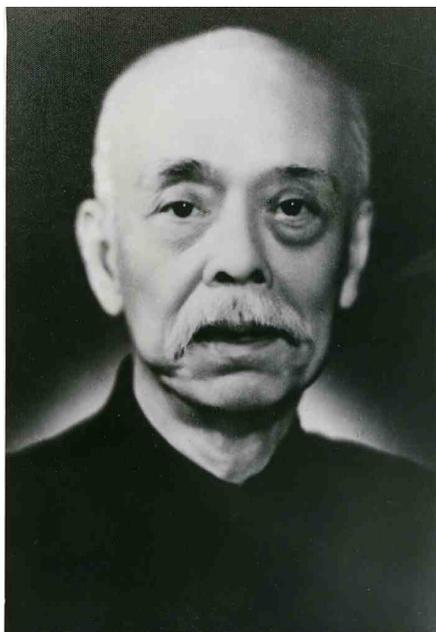


章伯钧(1895—1969)，安徽桐城人。农工党第三、四、五、六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

1920年武昌高等师范毕业，任安徽宣城师范学校校长，因聘恽代英、萧楚女等任职不容于当局被解职。1922年留学德国柏林大学攻读哲学。1923年参加中

国共产党。1926 年获哲学博士学位回国，任中山大学教授。1926 年 7 月参加北伐战争，任北伐军总司令部政治部宣传科长、秘书长、副主任，第九军党代表。参加“八一”南昌起义，被任命为起义军总指挥部政治部副主任，南昌起义失败后去香港，遂脱离中国共产党。1928 年在上海与谭平山等酝酿成立中华革命党。1930 年 8 月 9 日出席农工党第一次全国干部会议，当选为中央干部会干事。1933 年参加“福建事变”，任“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土地委员会主任。抗日战争时期，参加抗日和民主活动，受聘为第一、第四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41 年参与筹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任中央常委兼组织部长。1947 年民盟被迫解散后，同沈钧儒等在香港召开民盟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在香港恢复民盟总部，并与中国共产党合作。1948 年响应中国共产党“五一”口号，从香港赴东北解放区参加筹备新政协。1949 年 9 月出席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交通部部长，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副主席，《光明日报》社社长等职。是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一、第三届全国政协常委，第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



彭泽民(1877—1956),广东四会人。农工党第二、四、五届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第六届中央委员会副主席。

1906年加入中国同盟会,是吉隆坡分会负责人之一。1924年回到广州参加民主革命活动,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

员、海外部部长、国民政府委员。1927年参加“八一”南昌起义，任革命委员会委员。1930年8月9日在农工党第一次全国干部会议上被选为中央干部会干事。抗战爆发后，向国民党提出《抗日救国的八项主张》，在香港创办《抗战华侨》宣传抗日。1941年皖南事变后，同宋庆龄等联名写信给国民党当局呼吁团结抗日。抗战胜利后，在香港领导南方民主运动，并任“反内战大同盟”常务委员。1948年代表农工党响应中国共产党“五一”口号，从香港赴东北解放区参加筹备新政协。1949年9月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政法委员会副主任，全国侨联副主席、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中医研究院名誉院长等职。是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第二届全国政协常委。



季 方（1890—1987），字正成，江苏海门人。农工党第七、八届中央委员会主席、第九届中央委员会主席、名誉主席。

早年就读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参加辛亥革命和讨袁之役。1924年任黄埔军

校特别官佐。大革命时期，任北伐军总司令部政治部组织科科长，第二十二师党代表，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中将军事指挥，第四军教导团参谋长。1930年8月9日出席农工党第一次全国干部会议，当选为中央干部会干事。“七七事变”后，前往上海参加宋庆龄发起建立的“华东武装抗日自卫委员会”及其抗日活动。1938年后，联络和组织江苏地方武装参加抗日，先后任国民政府战地党政委员会少将指导员、江苏省第四区（南通）游击指挥部总指挥、新四军苏中第四军分区司令员、苏中行政公署主任、苏皖边区政府副主席等。1948年任华东解放军官教导总团团团长。1949年9月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交通部副部长、江苏省副省长等职。是第一至五届全国人大常委，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三、四届全国政协常委，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周谷城(1898—1996),湖南益阳人。农工党第九届中央委员会主席、第十、十一届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

1921年北京高等师范学院毕业。历任长沙第一师范学校教员,湖南省农民运动讲习所教师,全国农民协会宣传干事。

1927年秋到上海，为上海商务印书馆《教育杂志》、《东方杂志》等撰稿，并在中国公学等校兼课。1930年秋，任中山大学教授兼社会学系主任。1931年秋任暨南大学教授，兼历史社会系主任。1934年后，任复旦大学教授，曾兼史学系主任、教务长。1930年加入农工党。解放战争时期，积极参加民主革命运动，成为当时复旦大学著名的民主教授之一。1949年9月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复旦大学教授兼教务长，上海市人民政府委员，中国史学会常务理事、主席团成员、第一任执行主席，上海市史学会会长等职。是第一、二、三、五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六、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教科文卫委员会主任委员，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



卢嘉锡(1915—2001),福建厦门人。  
农工党第十、十一届中央委员会主席、  
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

1934年厦门大学化学系毕业,获理学  
学士学位。1939年英国伦敦大学学院化  
学系研究生毕业,获博士学位。1939年

至 1945 年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加州大学和美国国防研究委员会马里兰州研究室从事科学研究工作。1946 年至 1960 年历任厦门大学教授、化学系主任、理学院院长、副教务长、研究部长、校长助理。1960 年至 1980 年历任福州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副校长，中国科学院华东、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所长、研究员，福建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福建省政协副主席。1980 年后历任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学部主席团执行主席、化学部委员，中国科协副主席，中国科学院学部主席团名誉主席、中国科学院特邀顾问，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副院长等职。是第三、五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第六届全国政协常委、第七、九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科学院院士。



蒋正华（1937— ），浙江人。农工党第十二届、十三届中央委员会主席。

1959年毕业于西安交通大学。毕业前于1958年在西安交通大学自动控制教研室任助教。1978年任西安交通大学系统工程所讲师、人口研究中心副主任。1980

年至 1982 年在印度孟买国际人口科学院学习，研究生毕业。2004 年获美国明尼苏达大学荣誉博士学位。1982 年起任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经济研究所所长，并于 1984 年由国务院特批越级晋升为教授，1985 年任博士生导师，1991 年起任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其间，曾任美国斯坦福大学、法国巴黎政治学院、印度国际经济研究中心客座教授、联合国专家等职。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校院长、顾问、博士生导师等。清华大学、复旦大学等校兼职教授。是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八届全国政协常委，第九届、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桑国卫（1941— ），浙江人。农工党第十四届中央委员会主席。

1958年9月至1962年8月上海第一医学院药学系药学专业学习。1962年9月至1966年9月上海第一医学院医学系药理专业研究生。1966年10月至1999

年2月在浙江省医学科学院工作，历任药物研究所研究实习员、助理研究员，药物研究所兼计划生育所副研究员、研究员、所长、WHO人类生殖研究合作中心主任，浙江省医学科学院副院长(1991年7月至1997年5月)。1997年5月至1998年3月任浙江省卫生厅副厅长，1998年3月至1999年2月任浙江省人民政府省长助理。1999年2月至2003年4月任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副局长；1999年2月至2006年任国家药典委员会秘书长；1999年2月至2007年8月任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所长、中国生物制品标准化委员会主任委员、WHO药品质量控制研究与培训合作中心主任。1999年至2006年任中国工程院医药卫生学部副主任。中国药学会第21届、22届、23届理事长。是第七、八、九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副主任，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工程院院士。



陈 竺（1953— ），江苏镇江人。农工党第十五届中央委员会主席。

1970年至1975年，在江西省信丰县、横峰县插队。1975年至1977年在江西省上饶地区卫生学校医士专业学习，1977年至1978年任江西省上饶地区卫生学校

内科教研组教师,1978年至1981年上海第二医学院医疗系一部血液病学专业硕士研究生。1981年至1984年,上海第二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内科住院医师。1984年1989年,法国巴黎第七大学圣·路易医院血液中心实验室外籍住院医师,血液学研究所博士研究生、博士后。1989年至1993年,上海第二医科大学(现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内科主治医师,上海血液学研究所分子生物学实验室主任、研究员。1993年至1995年,上海第二医科大学附属瑞金医院上海血液学研究所副所长。1995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1995年至2007年,上海第二医科大学附属瑞金医院上海血液学研究所所长。1998年国家人类基因组南方研究中心主任。2000年至2007年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2000年当选第三世界科学院(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2003年当选国际科学院协作组织主席、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2005年当选法国科学

院外籍院士，2006年起兼任上海交通大学系统生物医学研究院院长。2007年至2013年任卫生部部长。2010年当选中华医学会会长。2013年当选英国皇家学会外籍会员。2014年当选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会长。2015年当选中国红十字会会长。是第十届、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科学院院士。



### 方荣欣（1912—2010）

农工党第九、十届中央委员会副主席、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常务副主席、第十二、十三届中央委员会名誉副主席。历任全国政协筹备委员会秘书处科长、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厅第一科科长、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处长、副局长、国务院参事等职。是第五、九届全国政协委

员、第六、七、八届全国政协常委。



## 李 蒙（1937— ）

农工党第十一、十二届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十二、十三届中央委员会常务副主席。历任黑龙江省哈尔滨大电机研究所自动化室设计员，四川东方电机厂副总工程师、副厂长，四川省省长助理、四川省副省长等职。是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

副主任委员，第十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 陈宗兴（1943— ）

农工党第十二、十三届中央委员会副主席、第十四届中央委员会常务副主席。历任西北大学校长、西安市人民政府副市长、陕西省人民政府副省长兼国家杨凌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管委会主任、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校长、陕西省政协副主席等职。是第十一届全国政协

副主席。



### 刘晓峰（1947— ）

农工党第十四届中央委员会副主席、第十五届中央委员会常务副主席。历任四川省交通厅航务管理局高级工程师、副局长，四川省交通厅副厅长、四川省人民政府副省长等职。是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